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史景遷的中國歷史敘事—在宏觀與微觀之間

Jonathan D. Spence Narrating Chinese History: Between Micro
and Macro Perspectives

研究生：李庭甫

Ting-Fu Lee

指導教授：石之瑜 博士

Dr. Chih-Yu Shih

曾怡仁 博士

Dr. Yi-Ren Dzung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June 2017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審定書

本校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研究生李庭育(學號：M036020025) 所提論文

史景遷的中國歷史敘事—在宏觀與微觀之間
Jonathan D. Spence Narrating Chinese History: Between Micro
and Macro Perspectives

於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25 日經本委員會審查並舉行口試，
符合碩士學位論文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簽章：

召集人 溫洽溢 溫洽溢

委員 曾倚萃 曾倚萃

委員 石之瑜 石之瑜

指導教授 石之瑜 石之瑜

指導教授 曾怡仁 曾怡仁

摘要

任何文本的背後，在某種程度上都包含了作者的想法和概念，歷史著作也不例外，就連最傳統的歷史學者也知道沒辦法「完全」客觀地重現過去的歷史，畢竟從議題選擇開始，到章節的安排、情節的設置與用字遣詞等，都包含作者主觀的認知在其中，而身為美國漢學界「三傑」之一的史景遷教授，他的影響除了觸及史學界之外，還擴及了民間的普羅大眾，這與他獨特的著史方式及寫作手法有著密切的關聯，而這些表現背後所隱藏的概念，無疑將會淺移默化地形塑讀者們對於中國的認知，並進而影響他們之後對於中國的看法與觀念。

而拜史氏的著作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廣大的歡迎之便，我們可以藉由了解其著史的特色與思考脈絡，來更清楚地掌握西方人對於中國的想法。是以本研究從「微觀」與「宏觀」的角度來對史景遷教授的著作進行分析，並將其著作所表現出來的特色與後現代主義的概念進行比較，讓讀者在理解其與後現代史學差異的同時，也能了解其背後所隱藏的著史概念。

關鍵詞：史景遷、歷史敘事、宏觀、微觀、後現代

Abstract

Behind every text, it all contains the author's ideas and concepts to a certain degree, historical writing is also no exception. Even the most traditional historians knew that it's impossible to represent the history "completely" objective, after all, from issues-choosing to chapters' arrangement, plots-setting, and words-using, the texts are consisted of authors' subjective cognitions. As one of "the Three Sages" in sinologist circle of U.S.A., Spence's influences infiltrated into historiographic circle, also the general populations, which are related intimately to his unique techniques of texts writing. Without a doubt, the concepts and presentations behind those writing will be unconsciously influenced to shape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s toward Chinese, and have further impacts on their perspectives and ideas with regard to Chinese.

By bringing the convenience of broadly popular welcome from Spence's writings, we could realize them through the features and thinking path and thus grasp more obviously about the thinking way that westerners to eastern. This study analyzed Spence's writings with both macro and micro views, and drew a parallel between the features of his writings and post-modernism so that the readers learn the differences versus historiography of post-modernism, meanwhile,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behind his writings.

Key words: Jonathan D. Spence, historical narrative, macroscopic, microscopic, post-modern,

目錄

論文審定書.....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及目的.....	1
第二節：史景遷簡介.....	2
第三節：史景遷的「歷史敘事」.....	6
第四節：研究方法及限制.....	8
第五節：章節安排.....	9
第六節：分析框架——「宏觀」與「微觀」.....	9
第二章：史景遷宏觀視角下的中國	11
第一節：中國是一個「整體」還是「複雜個體的集合」？.....	11
第二節：中國的延續性.....	13
第三節：反對「西方中心觀」.....	16
第四節：與「後殖民主義」的前提假設不同.....	22
第五節：小結.....	24
第三章：史景遷微觀視角下的中國	26
第一節：史景遷的「微觀」表現.....	26
第二節：史景遷描寫人物的特色.....	28
第三節：史景遷筆下中國人物的特質.....	33
第四節：小結.....	38
第四章：史景遷與後現代歷史學	39
第一節：近代歷史學的樣貌.....	39
第二節：後現代思潮的出現及批判.....	42
第三節：史氏著作與後現代史學的差異.....	47
第四節：小結.....	52
第五章：結論——史景遷的定位	54
參考資料	57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及目的

史景遷近年來在兩岸三地相當受到歡迎，不僅在二零零五年來台時被當時總統陳水扁親自接見，甚至還盼望史景遷能夠寫一本「改變台灣」或是「追尋現代台灣」的書，並相信這會是對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最大的鼓勵。¹此外史景遷在二零一四年到北京大學演講的時候，也受到了像明星一樣的追捧，不僅演講廳快速地爆滿，在演講結束後找他簽名的人更是圍的水洩不通，粉絲甚至在給史景遷的提問紙條中寫道：「看見你就像看見搖滾明星」。²形成一股「史景遷風潮」，而這風潮從北京大學開始到北京的機場，再加上成都、西安、上海等，其所到之處的火爆程度有如春運搶票，復旦場的兩百張票在半小時內就被「秒殺」，使得史氏成為了近年來華人文化圈最知名的學者之一。然而史氏對於這次在中國受到的明星級待遇似乎有些始料未及，他在北大和翻譯一起吃飯時問他的翻譯：「我一個外國人，用英文寫作和演講，為什麼中國人對我這麼感興趣？」當時的翻譯只回了一個字：「帥！」。想當然爾，如此簡單的回答恐怕不是真正的答案，畢竟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眾多，但能在當代能夠這樣如日中天、名利雙收的學者卻又只有他一人，如此成就並不是簡單一個「帥」字就能解釋的，就在這樣存在著疑問的背景底下，筆者展開了對史氏的一連串研究。

筆者發現，雖然史氏是一位在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英國人，但史氏的中文還是很不錯的，不過由於中文並非史氏的母語，因此史氏在將中文文獻翻譯成英文時，偶爾會發生錯誤，汪榮祖教授就在對史氏《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的書評《夢憶裡的夢囈》中提到：「史氏開筆即寫張岱居處的樂趣，所謂『便寓、

¹ 鄒景雯，〈陳水扁接見史景遷盼他也寫台灣〉，《大紀元》，2005年11月14日。

² 靳錦，〈史景遷的中國行程，在搖滾明星與拒絕《環球時報》之間〉，《壹讀》，2014年第40期。

便交際、便淫冶』，史氏將作者的『便淫冶』譯作『有許多性欲發泄的機會』(many chances of sexual adventure)，然而，『冶』指『艷麗』；『淫』是形容『艷麗』之盛，所謂『淫雨綿綿』，是喻雨水之多，與性其實並無必然的關係。又或是史氏將張岱自問的：『學問與經濟，到此何所施』。中的『經濟』翻譯成『經濟學的知識』(knowledge of economics)，然而此處的『經濟』意思應該是『經世濟民』(statecraft)之意才對。」³陸揚教授認為，這是因為史氏接受的是屬於上一代的漢學家訓練，這使得他在解讀中國古典文獻方面會存在一定的障礙，有時需要精通漢語的學術助手提供幫助。但是據協助過史景遷的學者說，他對材料的領悟力極高，可以很快找出重點。⁴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史氏不僅能看懂文言文，甚至還對中國的史料有著敏銳的理解能力，如此的天分再加上史氏跨文化語境的身分，使他能夠擁有不同於一般人的視角來觀察中國歷史，讓他的著作不僅不同於一般的中國歷史著述，還能夠起到東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史氏的書籍不僅在英語世界膾炙人口，且在全世界都有讀者，許多人都是透過史氏的書來認識中國，因此筆者希望能在此研究中藉由對史氏著作的分析，來發現並了解史氏的想法。而得知史氏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因為就算到了二零一七年，美、日國家安全部門仍然具體用「大明王朝」，來形容中共。然而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熟稔明朝的官員少之又少，他們對明朝的印象哪裡來的？毫無疑問就是將中國明朝敘事化以及英語化的少數作者，史氏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二節：史景遷簡介

史氏為劍橋大學學士，於一九五九年至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研究所深造，一九六五年獲得博士學位，即留校任教至今，現為耶魯大學教授、歷史系和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並於 2004-2005 年間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並獲得麥卡瑟基金會、美

³ 汪榮祖，〈夢憶裡的夢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9 年第 65 期。

⁴ 陸揚，〈史景遷的侷限〉，《東方早報》，2014 年 3 月 27 日。

國國會圖書館、《洛杉磯》時報等機構頒發的各種榮譽及獎章，不僅在二零零一年被英國女王授予勳爵爵位，且在二零一零年被美國人文科學基金會授予「傑弗遜講席」這一美國人文科學最高榮譽。

關於史景遷這個中文名，主要一說是由他的老師房兆楹給他取的，意思為「景仰司馬遷」，其妻子金安平則為台灣出生的美籍華人，亦為歷史學者。史氏與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三人被稱為北美漢學三傑。在顧思齊對三傑的評論中，史景遷以敘事跟文筆見長，孔飛力以方法和角度見長，魏斐德則以選題和史料見長。⁵雖然被公認為十六世紀以來最具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然而史氏並不認為自己是一位漢學家，在史氏看來，漢學的研究範疇包括古漢語、古代文本的傳統，以及儒學和更早時期各種學術流派的相關知識，因此史氏認為這是一個龐大的學術領域，在這樣的認知下，史氏並不認為有多少人能被稱作漢學家。⁶

一、家庭背景及早年經歷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倫敦市郊薩瑞郡(Surrey, England)的書香世家，一九二零年代後期他的父親德莫特(Dermot Spence)先後在牛津大學及海德堡大學任教，能說一口精良的德語，其外公則是在一戰期間於英國西部城市的克里夫頓學院(Clifton college)教書，他母親則是醉心於法國文學研究，史景遷有著三位兄弟姊妹，兩位兄長分別是古典學者跟化學工程師，還有一位妹妹則是電影製作人，同時也是法語、德語、義大利語的專業譯者。

史氏在十三歲時，進入英國南部的溫徹斯特學院就讀，那是英國最古老的公立學校之一，在溫徹斯特的時候，他勤奮學習，並廣泛閱讀，曾獲得歷史獎學金，此外他也常溜進祈禱室，讀法語或德語的讚美詩，並寫詩，不過他自認評論的才華甚於創作。⁷當一九五四年他從溫徹斯特畢業時，他已經服完兩年兵役，這兩

⁵ 顧思齊，〈本土視野的美國「漢學三傑」〉，《南方都市報》，2006年2月13日。

⁶ 黃山、龍周園，〈史景遷：漢學家沒幾個，我也不是〉，《財新博客》，2014年3月31日。

⁷ 李宗陶，〈史景遷的歷史之味〉，《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4月15日。

年史氏大部分時間都駐守在德國，而這兩年對史氏是有益的一課，它讓史氏學會在傳統英國社會之外觀察和思考。⁸隨後史氏考入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專業是英國史，他很快地便躋身於學校的頂級文學圈子，成為校刊《格蘭塔》的編委，並在二年級時被任命為校報《大學》的主編。

二、如何踏上研究中國歷史之路

從英國史轉向中國史，史氏於受訪時表示，是出於「偶然」。⁹因完成大學課程後，他獲獎學金參加了耶魯大學與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合辦的一個交換生計畫。但其實他並沒有申請參加這一計畫，而是被學校邀請才參加的。在到達耶魯後，史氏才決定專研中國，因為在耶魯大學才設有專門的中國研究機構，有著不同的學者專攻各種關於中國的知識，包括歷史、文學、政治和經濟等。¹⁰而史氏在那裡遇到了他的老師芮瑪麗(Mary Wright)和芮沃壽(Arthur Wright)夫婦，在他還沒開始學漢語之前，芮瑪麗就介紹他讀各種跟中國有關的著作，像是瞿同祖的《中國地方政府》、何炳棣的《社會階層流動》、張仲禮的《中國士紳》等，而這些著作奠定了史氏對於中國研究的基礎。¹¹

碩士畢業後，史氏留在耶魯繼續攻讀博士，這對他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抉擇，他在訪談中表示：「實際上，以前我只是為了自己的興趣學中國，而讀博士就意味著我要把研究中國作為自己的職業了。那時我還不能確定，是不是應該嘗試這個研究，因為在中國有很多非常好的中國歷史學家。」¹²不久後，史氏藉著匿名贊助人所提供到中國進行研究的獎學金到澳洲求學，師從房兆楹這位於一九四六年離開中國的學者。史氏說道：「房先生意識到，無論是共產主義中國，還是蔣介石統治下的中華民國，甚至是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都不是他的棲身之所。他的歸宿在澳大利亞。」¹³房兆楹是一位滿腹經論的華人學者，在楊聯陞給周一

⁸ 同上註。

⁹ 同上註。

¹⁰ 洪敬富，〈史景遷：蒙幸運眷顧的史學家〉，《南華早報》，2013年8月19日。

¹¹ 盧漢超，〈史景遷談史〉，《史林》2005年第2期。

¹² 李新、馬娟，〈史景遷：中國文化的複雜性讓人著迷〉，《21世紀經濟報》，2007年6月16日。

¹³ 洪敬富，〈史景遷：蒙幸運眷顧的史學家〉，《南華早報》，2013年8月19日。

良的信中就曾說到：「論明清史料史事，今日當推房兆楹、杜聯誥夫婦。」¹⁴而房兆楹則用中國傳統的師徒方式教導他。¹⁵史氏回憶時也說到：「當我在房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下完成了關於曹寅的研究論文，從而開始我自己的教學生涯並打算進一步研究中國問題時，我對房先生的感覺是難以言傳的，這種感覺包含著敬畏、崇拜、喜愛和警醒。」¹⁶史氏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習了一年，每週與房兆楹見一次面，閱讀和討論關於十八到十九世紀期間中國朝代的相關資料。而當時的台灣，正好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歷史資料，因為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撤離中國時，攜帶了好些朝廷檔案。而這些檔案保存了康熙皇帝的原始記錄。當時房兆楹正好有個朋友在台灣擔任檔案館館長，因此史氏成為了第一位獲許研究這些檔案的西方學者，而他也成功地利用這些資料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

三、著述

史氏的博士論文《曹寅與康熙》於一九六五年出版，並獲得了珀特爾論文獎(The 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當時的著名中國學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即表示：「清朝歷史研究將從此處改變(Qing historical studies will never be the same)。」¹⁷其個人專著共有十餘本，較有知名度的有《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密》(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The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婦人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Treason by The Book)等書。其中多數作品獲獎，如《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獲一九七五年克里斯托弗圖書獎；《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獲一九八三年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哈羅德紀念獎；《中國縱橫：一個漢學

¹⁴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¹⁵ 李宗陶，〈史景遷的歷史之味〉，《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4月15日。

¹⁶ 史景遷，《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上海遠東，2005，412頁。

¹⁷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Jonathan Spence B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From the General Meeting Booklet. AHA Annual Meeting. 2005.

家的學術探索之旅》獲一九九六年美國中國研究協會最佳著作獎等，他的著作也受到了讀者的大量歡迎，《追尋現代中國》不僅連續數周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單，並被翻譯成中、日、德、法、西班牙、土耳其等國語言，甚至更是被許多學校的歷史系列為必讀書目，其中《天安門》一書更是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稱讚為「西方中國研究的里程碑」。

第三節：史景遷的「歷史敘事」

史氏的著作比起一般的史書而言，他的風格來的更為生動有趣。因為主流的史學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而實證主義的奠基者孔德(Comte 1798-1857)亟欲建立一門歷史的科學，其以摒除敘事闡釋，迎合科學解釋為宗旨。創刊最早的德國《歷史學報》(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59)在其創刊詞便宣稱：「本刊擬是，且最重要的是一種科學的刊物。它首要的任務即是展現史學研究的真方法，且突顯其岐出。」¹⁸之後的《英國歷史評論》(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886)則是再三重申其「本諸科學精神，追求歷史真理」，並乾脆定位讀者群為同行的「專業史學工作者」，而將一般大眾視為「次要」。¹⁹黃進興教授就認為：「不論當時他們心目中的『科學』為何，可以確定的是歷史著作的表達方式必須『捨(文學)敘事，就(科學)論證。』」²⁰這些人希望史學朝向自然科學發展，常強調史學的科學性、真實性跟客觀性，然而這樣的方式卻使史學失去可讀性，使得史學脫離一般大眾，變得枯燥乏味。

史氏反對這樣子的行為，他透過多種方式來使自己的著作變得更有意思，以便吸引一般大眾閱讀，除了注重寫作技巧之外，民眾感興趣的點也是史氏寫作時所考慮的，例如他在《王氏婦人之死》(1978)一書中的開頭即講述一六六八年郟城大的地震，原因可能就是因當時中國剛發生過唐山大地震(1976)，史氏希望能夠

¹⁸ Prefac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6),p. 171.

¹⁹ Ibid., prefatory Not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P. 177.

²⁰ 黃進興，《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180 頁。

藉由此舉來抓住美國民眾對於震後中國所產生的微妙心理，使其著作在開篇便能緊緊吸引讀者。²¹

另外，史氏在有些著作的情節安排上，會將眾多的因素編排在前面，而最能反映歷史主題的因素編排於後，使其情節發展呈現一種由多到少、弱到強的特徵。²²例如《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的布局，史氏在書的序言中就表示：「本書前五章無非是第六章的延伸解釋，而第六章則完全移譯自康熙本人於康熙五十六年草擬的《臨終諭旨》。」²³以及《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中的最後一節，史氏幾乎原文不動移用了利瑪竇的原文，因為在他看來這剛好是「作為他自己一生的總結」。²⁴馬敏教授就表示：「史氏的著作承續了從希羅多德到修昔底德的西方古典敘事史的傳統，並將之發揚光大，使歷史學重新變得多采多姿，令人讀來有趣。」²⁵

從上述我們可以知道史氏的著史方式是敘事型的，而敘事史的長處則是在對於歷史事件進行「描述」而非「分析」，同時描述的中心也在於「人」而不是「外在環境」。²⁶因此，史氏遭到了一些學界的批評，例如來自布魯斯·瑪茲利士(Bruce Mazlish)在一九九二年一篇名為《胡若望疑問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the Question of Hu)的書評，文中瑪茲利士認為《胡若望的疑問》是一本小說，而不是歷史著作，因其認為史氏在書中只生動地講了一個關於「瘋子」的故事，但主角為何而瘋，史氏卻沒有回答。馬茲利士強調，歷史是在思考，同時也是在講故事，雖然史學家與小說家都在講故事，但史學家與小說家不同的是，史學家在講故事的同時，也是在提出問題並試圖回答問題，不過在《胡若望的疑問》一書中，卻缺少了回答問題這個環節。主角胡若望從中國被帶到法國，在不同的文化氛圍裡做出許多令西方人不解並看作是瘋子的行為，這些行為要與中國特定的歷史文

²¹ 陳國棟，〈評 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新史學》，2000 年第 11 卷，第 3 期。

²² 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 153.

²³ 史景遷，〈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序言，22 頁。

²⁴ 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 153.

²⁵ 馬敏，〈耶魯怪傑史景遷〉，《讀書》，1996 年 6 月，第 6 期。

²⁶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1979.

化結合才能產生合理的解釋，但是史氏卻根本無意提及。因此其書乃是接近歷史小說，而非史學著作。²⁷

不過這樣的狀況並不是史氏無能為之，而是他無意為之，史氏在受訪時即表示：「我並不在章節結束時做道德批判，我願意讓著作的結構來呈現一種道德評說和道德環境。」²⁸史氏也明言其寫作的目的是為了培養讀者的個人興趣，「如果說我有一個學派，那這個學派就是促使或鼓勵讀者去思考」。²⁹他也清楚這樣的寫史手法很有可能被人稱之為小說技巧，但他並不以為意。³⁰是以在史氏看來，將歷史如實地敘述出來，歷史家已完成了責任，至於讀者會從中得出什麼結論或看法已不再是歷史家的事情了，馬茲利士的批評不過只是另外一種史學的認知罷了。

第四節：研究方法及限制

本文主要以歷史學及人文科學較常使用的文本分析法中的敘事學分析法來檢視史景遷的著作，如同浦安迪(Andrew H. Plaks)教授在《中國敘事學》中所說的：「敘事就是作者通過講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經驗的本質和意義傳示給他人。」³¹藉由分析史氏的敘述視角、敘述態度及敘事結構，來了解文本的內部結構，而不只是關注文本所承載的社會歷史內容，這讓我們可以透過觀察史氏筆下的著作，來了解史氏著史的特色及其背後的動機。

然由於史氏已高齡八十歲，在近年也沒有訪華的行程，因此筆者並無機緣進行訪談，但史氏受訪的資料眾多，再加上著作頗豐，這些資料對於其生平以及學術生涯均有詳述，因此我們還是可以透過這些資料來了解史氏的經驗脈絡形成及其作品的特色。但因筆者並非專業的歷史學家，且已有多位學者前輩做出深入分

²⁷ Bruce Mazlish. *The Question of the Question of Hu: History and Theory*, Vol.31, No. 2, 1992.

²⁸ 盧漢超，〈史景遷談史〉，《史林》2005年第2期。

²⁹ 同上註。

³⁰ 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 166.

³¹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析，³²因此本文中並不會就史氏的歷史哲學觀、歷史思想等方面進行深入討論。

第五節：章節安排

本研究主要透過觀察史氏在著作中的「宏觀」與「微觀」表現，並整理出其特點，而後將其與傳統的近代史學與後現代史學的觀點作比較，讓讀者更能了解史氏的特色及其定位。本文架構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內容主要介紹筆者的問題意識及對史氏的背景作簡單的介紹。第二、三章的部分，將詳細介紹史氏在宏觀及微觀視角上的特點，並從史氏的訪談及其著作中的表現來論證他的看法。第四章則是介紹後現代史學產生原因及其特徵，並對史氏全部的十五本專著作簡單的介紹及分類。結論則是依照史氏的這些特色，試圖分析其在歷史學上的定位，並嘗試解答史氏為何在中國如此受歡迎的原因。

第六節：分析框架——「宏觀」與「微觀」

對於宏觀史學的解釋在史學界大致上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指關於史學理論及歷史理論的研究，即對歷史表象的抽象、綜合研究或對歷史事實的概括分析，其研究對象往往是總體性的、綜合的、跨越時空的，其表現形式往往是說理的、分析的而非描述的，其結論往往是規律性的。比如說對於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歷史統一性與多樣性或史學研究的主體與客體、史學功能、歷史規律、歷史發展動力、歷史創造者等問題的研究。第二種則是認為，凡只要是對一個社會、一個時代，或幾個社會和幾個時代的研究，甚至是對一種制度、一種跨時空歷史現象的研究，只要不是拘泥於某一特定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都能算是宏觀史學的範疇。

從史氏的相關著作來看，只有採用宏觀史學的第二種認知，其著作才有可能與宏觀史學稍做連結，因為史氏的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描述為主，且大多數都只

³² 如朱政惠的《史景遷史學探要》、李琛的《史景遷史學思想研究》、何吉龍的《史景遷的中國研究》等。

描寫少數人物或特定事件。而在史氏所有著作中，最接近於宏觀研究的書，應該當屬《追尋現代中國》一書，此書是史氏描寫十六世紀末至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其橫跨了四百年來中國的四個朝代。因此為了解史氏的宏觀史學概念，在本文第二章宏觀視角的部分將主要觀察《追尋現代中國》中史氏是如何描寫中國的。

而「微觀史學」一詞最早是由義大利史學家卡羅·金茲堡（Carlo Ginzberg）等人在一九七零年代末提出來的，指的是在本質上縮小觀察規模，進行微觀分析和細緻研究文獻資料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因此有人認為從事微觀史學研究的史學家，是不會把注意力集中在涵蓋遼闊地域、長時段和大量民眾的宏觀過程的，而只注意個別的、具體的、一個或幾個事實，或地方性事件。並認為這種研究取得的結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廣到環繞某個被研究的事實的各種歷史現象的所有層面。³³而在這樣理解下的微觀史學，因為過於的關注具體個案的細節，因此只能注意到局部的變化，進而導致缺乏足夠綜觀全局的視野，很容易引起歷史研究的「零碎化」，使得歷史研究產生「見樹不見林」的現象。

然而，也有學者對於微觀史學有著不同的認知，他們認為微觀史學家並不是僅局限於對某個微觀現象的孤立研究，而是盡可能地透過對於微觀現象的研究來發現其他方面的現象。這不是簡單地用微觀的共同體(社區、家庭、個人)來代替宏觀的共同體(如國家、民族等)，而是要改變研究的原則。即研究的對像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概括的。因此，微觀史學的對像不只是很小的對象，它可以研究一個或幾個人，也可以研究單位，一個村莊，甚至一個城市和地區。³⁴

這兩種對於微觀史學的不同認知，差別在於對其能解釋的歷史現象範圍認知不一，而在這點上筆者認為史氏比較傾向後者，這在之後第三章微觀視角的部分將會有詳細的說明。

³³ 于書娟，〈微觀史學與我國的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科學研究》，2007年12月。

³⁴ 同上註。

第二章：史景遷宏觀視角下的中國

在筆者閱讀過史氏著作後，發現史氏宏觀概念有四個特點，其一是中國內部複雜多變，並不是外界所認知的「單一個體」；二是中國歷史有著自身的延續性；三是其反對由漢學前輩們所形成的「西方中心觀」；四則是史氏不認同「後殖民主義者」所陳述的悲情論調。

第一節：中國是一個「整體」還是「複雜個體的集合」？

西方對中國的印象在好幾個世紀以來，存在著負面和正面，有些人批評中國的一切，如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在魯賓遜漂流記續集³⁵中批評中國的建築、食品、文化等，或如喬治·安森(George Anson)等，把中國形容成落後的蠻夷之邦，但也有人把中國形容成美好、充滿理性的國度，例如歌德(Johnn W. von Goethe)就說：「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也更道德。」萊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更是說到：「他們服從長上，尊敬老人，無論子女如何長大，其尊敬兩親猶如宗教，從不作粗暴語，尤其使我們驚奇的，中國農夫與婢僕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面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伏爾泰(Voltaire)就在其在改編自《趙氏孤兒》的歌劇《中國孤兒》³⁶裡如此陳述：「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孝順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

不過，卻有一個共同的認知是普遍存在於大部分西方人心中的，那就是——中國總是以一個「整體」的形象出現在西方人眼前，而這得從西方人長久以來對於中國的認知說起。史氏認為西方人對中國的認知最早來自西班牙人門多薩

³⁵ 《魯賓遜·克魯索的更遠歷險》(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³⁶ 傳教士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Prémare)將《趙氏孤兒》翻譯成法文(Tcho-chi-cou-eulh)，被收錄於由杜赫德神父(Père Jean-Baptiste Du Halde)編寫，於1735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中。伏爾泰根據馬若瑟的譯文所改寫的《中國孤兒》，與紀君祥的原版相比，在形式、情節、人物、時代背景上都大相逕庭，可說是一個全新的故事。

(Mendoza)在一五八五年以西班牙文為教皇寫的《大中華帝國史》³⁷。而這本著作，門多薩是以當時來華的西方水手以及外交人員的所見所聞而寫成，雖然因為當時明朝的萬曆皇帝對西方世界不感興趣，也因此這些人基本上都是以失敗收場，不過這些人在失敗之餘回到西方後，卻共同描繪出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中國。史氏如此寫道：「由於「這個國家的組織仍然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早在一五八五年，在西方人的意識中就產生了強盛的、一體化的中國觀念。在這段歷史時期，歐洲不僅第一次獲得了對中國政府的認識，而且得到了中國的編年史。」³⁸而門多薩的這本著作，在十五年內就以七種語言出版了四十六個版本，可以顯見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以及這本書影響西方人的範圍是如此之大，而這樣的一個觀念，就這樣持續下去，影響了之後好幾個世紀的西方人，其中包括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

例如一七四零年孟德斯鳩(Montesquieu)，在《法意》或譯《法的精神》一書裡分析各國政府樣態時，把中國歸類為專制的一人國家，又或是一八二三年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裡介紹中國的時候把中國形容成「單一的」，他是如此描寫的：「這全部政治內固然缺少主觀性的成分，同時它在臣民的道德心理內又缺乏一種基礎。『實體』簡直只是一個人——皇帝，他的法律便是一切。話雖如此，這樣漠視個性並不指有任性，因為有任性即有個性——即主觀性與流動性。可見中國的『國家的一尊』(the One Being of the State)是至高無上的，那個實體仍極堅硬剛強，與其他一切概不相似——並不包括其他的成分的。……中國人自視為屬於他們的家庭，而同時為國家的兒女。在家庭之內，他們不是人格，因為他們在其中生活的那個團結的單位乃是血統關係與天然義務。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少獨立的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係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為政府的基礎，治理國家的一切部門。」³⁹不論是對於中國政府的描寫，還是對於中國人心理道

³⁷ 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

³⁸ 史景遷，《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北京大學出版社，20頁。

³⁹ 黑格爾，《歷史哲學》，水牛出版社，197頁。

德的介紹，這些陳述都容易使西方人在想像中國的樣貌時，產生出中國是「單一的」、「整體的」的概念。

暫且不論十九世紀以前的西方，就連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也有許多人是如此認知，前海基會副董事長馬紹章就認為台灣人普遍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忽略了這個全世界變化最大的經濟體其實是一個由許多元素組合的複合物。而在中國眾多的組成元素中，中共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還有學術界、企業界、知識份子、少數民族、社會團體和一般人民等，不同的族群自然應該給予不同的對待，但台灣卻往往混為一談，如台灣對「陸生」的「三限六不」和「陸配」嚴格的領證限制即是最好的例子。⁴⁰然而，這樣的認知並不只存在於一般大眾，甚至是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也被認為是有這樣的想法，作家楊照就在文章中認為其是用「整體」的眼光在看待中國，試圖刻畫描述一個「整體」的中國。⁴¹

或許是不希望世人對中國再產生同樣的誤解，史氏筆下所呈現出來的中國充滿著複雜性，他不僅在書中提到中國自然環境的多種差異，而且其書中的每位人物都表現出自身的能動性，這些同樣身分背景的人所做出的選擇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這點就與黑格爾所陳述的中國人樣態不同，在史氏筆下的中國人每位都有著獨立的人格，他們會依自身的價值觀、環境、個性等，去作出行動，也因此，史氏所呈現出來的中國其實是一個「由複雜個體所集合起來」的中國。雖然這樣的複雜中國可能會讓西方讀者如墜五里霧中，摸不著中國的頭緒，但史氏正而是因為想讓讀者能更了解真實的中國樣貌，才如此做的。也因此，他在受訪時就表明：「能一目了然的東西並不存在。我們對中國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離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實性也就越近。」⁴²

第二節：中國的延續性

⁴⁰ 郭欣華，〈即將被查的眾官〉，《內幕》第 56 期。

⁴¹ 楊照，〈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聯合報聯合副刊》，2006 年 2 月 23 日。

⁴² 李宗陶，〈史景遷的歷史之味〉，《南方人物周刊》，2014 年 4 月 15 日。

在史氏和約翰·威爾斯(John wills)合編的《從明朝到清朝》(From Ming to Ch'ing)一書中，他們論證了兩種看法，一種是強調跨越明清兩代的長期趨勢，另一種則是特別強調滿清對於帝國後期歷史的作用。在這本書中，史氏和威爾斯都認為從明末(1590年)到盛清(1730年)間，中國有著一種，「內在的連貫性」。它表現在「從東林豪傑直到清初的一些偉大學者，如王夫之……都有一種強烈的、個性色彩濃厚的對儒教道德理想的追求；或者表現再從十六世紀九十年代辦礦的太監到十七世紀末後與廣州『皇商』一脈相承的半官辦的商業。」⁴³

而筆者認為，史氏把他這樣的一個想法，延伸到他對中國的宏觀理解上，因為他在《追尋現代中國》的最後，同樣也描寫了一些中國好幾世紀以來不斷出現的現象，而這些現象，是每當中國的政權瀕臨崩潰時都存在的現象。「不負責任的領導階層、貪圖奢華的菁英集團，道德渙散的中產階級以及弱肉強食的農村、製造業部門，一同共處在頻臨困厄的邊緣：這類社會場景，不僅見諸於明朝遺老椎心刺骨地目睹他們的王朝，被不期然崛起的滿人所推倒，同樣也出現在清末的中國革命洪流，以及共產黨人秣馬厲兵對抗眾所公認的頹廢共和世界的那個年代。」⁴⁴

在史氏的描述下，這些導致政權崩潰的現象大致上可分成四種，分別是：
一、因腐化的官僚體系而造成的中央政府權力的弱化。

「清朝統治者耗費兩個世紀的光陰致力於理順官僚程序，整頓、監控各地的官員，讓各省臣服於中央的號令，以及滌除由腐化行為所造成的社會苦難。在國民黨統治下，隨著官僚體系的膨脹，以及因狡詐、無力感、顛預昏暗而導致中央政府權力的弱化，使得這場戰役益發艱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層曾經試圖徹底盪平過去權力腐化的弊病，現今卻察覺到即使是先進的科技計畫層級，依然無法擺脫地方主義與人性脆弱面的頑強桎梏。」⁴⁵

⁴³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⁴⁴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1061頁。

⁴⁵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957頁。

二、缺乏和平的權力轉移機制。

「在中國漫漫的歷史長河裡，一種和平、可長可久之權力轉移機制的闕如，困擾了袁世凱逝世後的民國政局，同時也嚴重弱化了晚清政權的國力，甚至還一度讓賢明的康熙皇帝陷入絕境。」⁴⁶

三、知識份子對政府的批判。

「這是一種富有深刻歷史共鳴的能量，而這一歷史的共鳴是由矢志不渝的中國知識份子所激盪出來的，他們堅持有責任去批判政府的種種陋習積弊，即使面對政府扼殺他們的批判聲浪，也不輕言放棄這種自我責任。無論是否出於自我意識，1976、1978、1984年走上街頭、高聲吶喊的中國人，分享了一九三零年代的反國民黨國民政府、一九二零年代的五四運動、十九世紀末的反清積極份子、甚至十八世紀『考證』學派的若干儒士、十七世紀的東林黨人和明朝遺老縈繞心中的情懷。即使中國政府不斷施以學術和政治壓迫，但我們仍有充分理由相信八九年的示威抗爭事件將會捲土重來。」⁴⁷

四、百姓對於政府的反抗。

「長久以來，中國的市井小民欠缺足夠、甚至無法接受教育的涵化，加上獨特之引導式意識形態的闕如所以無能反抗壓迫者或剝削者。然而對美好生活的引頸期盼，內心深處的徬徨無奈，以及極端惡劣的生活條件，這些因素均可能蛻變成反抗怠忽民瘼、因循苟且政府的驅力。手無寸鐵但又意圖殺害兵丁的人，只能憑藉著赤手空拳之力直到他們佔據敵人的軍械庫為止，明季的農民起義，追隨王倫、林清或白蓮教的教眾，捻亂、拳匪以及二十世紀湖南或上海的農民或城市工人，皆足堪證明人民對蒙遭輕蔑的忍受度是有限的。」⁴⁸

史氏特別描述出這些現象，或許有部分用意是在提醒共產黨，如果想要長治久安的統治中國，就要記取好幾個世代以來的教訓，不要再重蹈前朝的覆轍讓中

⁴⁶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1027頁。

⁴⁷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1028頁。

⁴⁸ 同上註。

國出現如此景象。但這樣的提醒同時也隱含著，中國社會是存在延續性的，不論是士人對道德的追求或是中國的商業模式結構，甚至是國家接近滅亡的樣態。

第三節：反對「西方中心觀」

拜後事之便，我們可從柯文(Paul A. Cohen)教授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中得知，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的美國，對於中國的認知主要是受到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與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等人的影響，他們均認為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基本上處在停滯狀態，循環往復，缺乏內部動力突破傳統框架，只有在經過西方衝擊後才開始產生轉變。

例如在一九四五年，費正清與鄧嗣禹在他們合寫的《中國對西方之反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的序言中說道：「既然中國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統國家，又有著最悠久的綿延不斷的歷史，它在過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躪就必然產生連續不斷，洶湧澎湃的思想革命，對這場革命我們至今還看不到盡頭……在充滿『不平等條約』的整整一世紀中，中國這一古代社會和當時居於統治地位的，不斷擴張的西歐與美國社會接觸日益頻繁。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這種接觸對古老的中國社會產生災難深重的影響。在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一系列複雜的歷史進程——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和文化的進程——對古老的秩序進行挑戰，展開進攻，是由一個更加強大的外來社會的入侵所推動的。它的龐大的傳統結構被砸得粉碎……經過三代人的更替，舊秩序已經改變模樣。」⁴⁹

在費正清等人的形容下，中國社會的進程其實是由西方外來入侵所推動的，而不是經由自身的動力。科文教授把這情形稱為「西方中心觀」，並舉出三種主要的「西方中心觀」模式。

第一種是：「衝擊-反應」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此模式認為在十九世紀中國歷史發展中起主導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線索是西方入侵，即認為中國在近代

⁴⁹ Teng and Fairbank.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

史上的進步，都是為了因應西方所帶來的衝擊而所產生的行動。

第二種是：「傳統-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此模式是認為西方社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楷模」(norm)，因此中國近代史也將按造此模式，從「傳統」社會晉升成西方「近代」社會，也就是說中國在近代史上的發展就是學習西方社會而擺脫中國傳統的一個過程。

第三種則是：「帝國主義」模式(Imperialism model)，此模式認為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史各種變化的主要動因，是中國百年來社會崩解、民族災難、無法發展前進的禍根，也就是認為中國近代史上的所有災難，都是導因於列強的外來入侵，並非其內部問題。

這三種模式都認為十九、二十世紀中國經歷的一切有歷史意義的變化，都是屬於西方式的變化，且只有在西方的衝擊下才能引發出這些變化。⁵⁰而筆者在整理史氏的《追尋現代中國》後，發現史氏對於中國的認知與他的前輩們稍有不同，這並不是說史氏認為西方對於中國沒有產生影響，而是當時美國學界誇大了西方的影響力，事實上中國產生變動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中國自己本身的內部因素，西方力量只是加強了這些內部因素的影響力。接下來筆者透過舉出史氏在《追尋現代中國》中對於明、清、民國、共產滅亡或所面臨問題的描述來證明此一觀點。

一、明代

雖然柯文教授所提到「西方中心觀」的相關論述主要是在探討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明代在時間上來講太早了，不過我們依然可以透過觀察史氏對於明末的描述來得知他對中國概念的形成，因為明代正是史氏研究中國最早的年代。而史氏提到明朝滅亡的原因是：「晚明國家與經濟結構組織的渙散，業已開始在各個不同層面浮現。財政入不敷出，朝廷無法如期發出軍餉，士兵的逃逸鼓勵虎視眈眈的北方部族進犯，歐洲白銀的流入對中國造成超乎預料的經濟壓力，官倉管理不善，天災四起，導致農村人口普遍營養不良，疫癘叢生。盜賊蜂起，匯而為

⁵⁰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寇，他們之所以嘯聚山林，無非只為了苟活於亂世，到了一六四四年，所有這些不利因素紛紛匯聚成流，肇致明思宗自縊身亡。」⁵¹這些史氏所陳述的明代滅亡原因裡面，也就只有歐洲白銀流入這個經濟問題是與西方有所關聯的，不過如果從史氏對於晚明經濟問題的描述上來看，明朝經濟陷入困境與歐洲白銀流入事實上並沒有太大的關連。

因為史氏雖然有描寫歐洲白銀流入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如通貨膨脹、投機性商業活動開始興盛，及農民因白銀與銅錢兌換比例的差異而造成變相加稅等的問題，但是從史氏對於晚明經濟困境的描述上看來，他並不認為歐洲白銀的流入是晚明經濟疲弱不振的主要因素，史氏在晚明經濟問題上寫道：「一六二零年，萬曆皇帝駕崩，不過在此之前，中國的經濟榮景就開始凋零。過去明朝昌盛的商業，曾經促成奢華商品在全國各地流通，以及經營匯兌業務的典當和票號行業的勃興。現在卻受到朝廷軍事挫敗的牽累。朝廷以農立國，無法有效對民間課徵稅收，極易受到各省玩忽法令的閹官及其黨羽的橫徵暴斂而蒙受傷害。朝廷治洪無方、賑濟無能，又加重了地方上的危機，反過來使得朝廷無法徵集足夠的賦稅。」⁵²從這段敘述可以看出，史氏認為晚明的經濟問題主要應該是腐敗的官僚所造成的，也因此，從整體上來看，明清交替這個中國近代史上的變動在史氏眼裡明顯與西方的關聯性不大。

二、清代

清朝末年中國所發生的事件和變革，很容易被人認為是中國在受到西方衝擊後而產生的反應，畢竟中國是在中英鴉片戰爭爆發之後才開始面臨劇烈的變動，像是太平天國、義和團所造成的八國聯軍，以及最後導致清朝覆滅的武昌革命等，這些現象看似都是由西方來扮演主導中國改變的力量，但是從史氏的描述來看，這些十九世紀所遭遇的危機，事實上早在西方入侵之前就已開始萌芽，中國的這些變動是其內部因素與西方勢力交互影響下而誕生出來的結果，西方的影響只是

⁵¹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002 頁。

⁵²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019 頁。

壓垮駱駝的眾多稻草中的其中一根罷了。

史氏是如此描述當時中國的：「十九世紀前半葉，英國多次重創中國，這與中國內部萌生的不穩定互為因果。先前已論及許多不穩定的因子，包括人口增長對土地造成空前未有的壓力，白銀大量外流，文士難覓官職，龐大鴉片吸食人口帶來的沉重負擔，八期軍戰力減退，和坤與其黨羽在官僚體系中所造成的腐敗風氣，以及伴隨白蓮教亂的起落而來的廣泛影響，其他早在十八世紀末就已顯而易見的種種流弊，十九世紀初更是變本加厲，管理黃河與大運河疏濬、築堤的龐大官僚體系日益敗壞無能；因人設事造成冗員充斥，而朝廷用作疏濬、築堤的庫銀往往被中飽私囊，結果大運河嚴重淤塞，而溝通黃河與淮河的大運河亦無法維持正常的河道水位，嚴重削弱了江南漕糧北運的機制，漕運機制的崩潰又衝擊了大運河沿岸仰賴運送漕糧為生之工人的生計；漕運工人個個拉幫結派，藉以保障飯碗或稱霸一方。」⁵³從此處我們可以得知，在史氏眼裡，中國十九世紀的動亂並不僅是西方入侵造成的，而是其與中國積習已久的弊端相互影響之下的結果。

另外，從史氏對鴉片戰爭的描述來看，更可看出其這樣的想法，他是如此描寫的：「英國擊敗滿清，在一八四二年締結了一紙條約，自此改變了清朝與外國強權的關係結構，結束了長久以來，中國統治者對其領土上外國人的實質控制。這種乍現的外來壓力，與一波波的內在動盪並行而至，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⁵⁴

這裡我們可以注意到，史氏的用詞是「推波助瀾」！而不是什麼具「決定性作用」之類的話語，因此我們可以得知，這些十九世紀中葉清朝所面臨的危機跟變動，史氏認為主要還是來自於前清的各種流弊。而至於最後讓滿清滅亡的武昌革命，史氏如此描寫：「若不是因立憲主義、鐵路、軍隊、滿人權力與列強入侵等問題引起全國動亂，它也許不過是一孤立事件、而為人所遺忘。」⁵⁵可以確定，至少在史氏的認知裡，清末中國發生變動的原因眾多，並不是每件都有與西方扯

⁵³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205 頁。

⁵⁴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174 頁。

⁵⁵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323 頁。

上關連，而這也就表示，西方更不必然地佔主導中國變革的力量了。

三、民國時期

在史氏對於民國時期的描述中，雖然有描寫西方勢力在中國運行的樣態，例如美國提供大量資金及技術人員給國民黨，俄羅斯派人來協助共產黨等，但史氏對於有關國民黨政權為何在大陸倒台的原因，則是幾乎看不見與西方有關的論述，國民黨的崩解在史氏來看主要都是源於國民黨本身內部的問題。

史氏是如此描寫國民黨政府的：「他們漫不經心、效率低落，尤其是貪汙腐化的行為，日益腐蝕了國民黨的群眾基礎。過去在戰爭期間公開與日本唱和的傀儡政權的軍隊與政客獲允留置原職，以堵絕共產黨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張，更是令百姓憤怒。」⁵⁶再加上「國民黨回應財政短絀的一貫手段就是印製更多的鈔票，但這只會讓通貨膨脹更加惡化，以 1945 年 9 月為基準，上海地區的躉售物價於 1946 年 2 月飆升為 5 倍，同年 5 月為 11 倍，1947 年 2 月為 30 倍。」⁵⁷這些描述顯示出史氏認為國民黨失去民眾支持的原因是來自於其錯誤的政治選擇及其造成了嚴重的民生經濟問題。

因此史氏說到：「共產黨正是在國民黨經濟與政治政策挫敗、喪失民心的氛圍下，才贏得關鍵性的軍事勝利。」⁵⁸ 他更覺得是因為蔣介石的錯誤的軍事決策才使得情況如此惡化，其在書中寫道：「國民政府用來戍守瀋陽的二十萬大軍，即使訓練精良，且配備大砲、裝甲車等裝備，一旦飛機場遭到破壞，這支精銳之師就只能坐困愁城、束手待斃。美軍軍事顧問建議將這支軍隊調回關內，已強化華北的防衛力量但蔣介石照例予以拒絕；他為了自己岌岌可危的威望，在這場戰役中投下過多賭注，以至無法撒手。」⁵⁹「國民政府軍隊指揮官困於蔣介石個人矛盾而不切實際的命令，以及部隊的大量逸逃。」⁶⁰「蔣介石確定華北失守已無可挽回時，即於十天前宣布下野，辭去總統一職，不過蔣氏能維持國民黨總裁之位，

⁵⁶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644 頁。

⁵⁷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660 頁。

⁵⁸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668 頁。

⁵⁹ 同上註。

⁶⁰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672 頁。

日後證明這種角色的分割只會混淆並挫傷抵禦能力。」⁶¹

這段論述可以清楚的看見史氏認為國民黨在大陸潰敗的主要原因其實是來自其領導人——蔣介石的昏庸，就算外國勢力嘗試去影響中國的變化，例如上述提到的軍事顧問建議或者其他一些如裝備、資金的援助等，還是沒辦法去改變中國的命運，它依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也就意味著，在這個中國即將改朝換代的重要之際，西方勢力依然沒有產生太大的作用。

四、中國人民共和國

就算解放軍的總參謀長跟政治局的常務委員，都認為是西方勢力在壓迫中國：「正是美國霸權主義者說三道四地干預」，「給予我們國家內部敵對因素分裂活動的公開支持，並反對、顛覆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或聲言美國的目標就是要「推翻中國政府，壓制中國的發展。」但史氏寫道：「事實上，儘管中國煞有介事地看待這些來自西方的威脅，不過倘若真有進行『分裂活動』、『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力量的存在，那這些力量必然起於中國內部，而不是受到西方世界傾全力或遮遮掩掩的支持。」⁶²

史氏在受訪時，曾被問到為何會出現這種與費正清等人不同的看法，史氏如此回答：「這也許與我史學訓練的英國背景多於美國背景有關吧。我二十歲到美國，此前是老派的英國觀點。我在英國受到的訓練中，中國並不重要，它不是大英帝國的中心，歷史研究較為注重印度，後來才是澳洲、加拿大、英聯邦，完全是從英國視角看世界歷史。那時英國難以控制中國，因為大家知道印度太大，英國無法在二十世紀統治印度，何況中國。在我單純的想法中，外國帝國主義雖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不是最為重要的一部分，這完全取決於如何審視貿易和條約港口，以及條約體系的性質。」⁶³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史氏眼中的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軌跡主要還是基於中國自身的內在生命和活力，並不是西方外在勢力

⁶¹ 同上註。

⁶²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1048 頁。

⁶³ 張燕冬、丘昭琪，〈史景遷：突破循環的歷史變遷〉，《財經》，2011 年 10 月 20 日。

的影響。

第四節：與「後殖民主義」的前提假設不同

後殖民主義所涉及的範圍相當龐大，其相關議題也十分繁雜，因此儘管後殖民主義可以追溯至一九六零年代，但後殖民主義其實至今仍未取得一個共識性的定義，而這些後殖民概念的歧異，一方面來自「後殖民」一詞本身在語意和使用上的不確定，一方面也來自批評家們對此概念的分歧性解釋。不過後殖民主義們卻有著一個共同的前提認知，就是他們都認為那些曾經被殖民的國家就算在脫離殖民母國後，文化或價值上依然會受到殖民母國的影響，因此殖民主義的結束，並不是殖民時代的結束，而是後殖民時代的開始。

這個理解可從「後殖民」一詞上看出端倪，「後殖民」(postcolonial)一詞在字義上即隱含著「殖民」的延續，亦即後殖民主義者們認為那些曾被殖民的國家只是從以前「殖民主義」的「軍事-領土」統治形態，轉變成新型的「經濟-文化」形式罷了，還是一樣被「殖民」著。因此，後殖民主義者大體上在做的事主要有兩件，一是：批判「殖民後」(after colonization)重新包裝的殖民主義，二是：透過「殖民論述解構」(deconstruction of colonial discourse)來尋求民族主體性的重建。⁶⁴

史氏在著作的時候是否帶有後殖民主義者的想法並不是很確定，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史氏看待中國的方式與後殖民者看待那些曾淪為殖民地的國家不同，雖然中國同樣在十九、二十世紀受到西方的衝擊，但史氏認為中國並沒有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或價值，反而還利用了西方所帶來的各種技術、資源。

傳遞出史氏此種想法的是在其《改變中國》這本書，此書涵蓋的範圍橫跨了三個世紀，從一六二零至一九五零年代。內容是描述十六位西方人在中國的經歷，這些西方人有著不同的專業、個性與目的，然而在史氏的描述底下，這

⁶⁴ 宋國城，《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伊德》，003 頁。

些西方人卻全部都以失敗作為收場，最後下場不是埋骨他鄉就是黯然離去。這些人來華的目的幾乎都沒有實現，而所帶來的技術卻又都被中國所吸收。(如果中國想要的話)

以下引用史氏對其中幾位人物最後的評判，讓讀者了解史氏的這個觀點。例如史氏對於明末清初來華傳教的湯若望和南懷仁是如此評價的：「試圖借助西方科技專業勸服中國人皈依天主的巧思，終告失敗。西方人雖然屢遭挫折，但心中仍抱樂觀，傳教士留下的敘述把中國皇帝說成改宗有望的教徒，堅稱朝廷官員開明，已走在真理之道上頭，而每一起迫教事件都被說成基督信仰大功告成的序曲。其實西方人對中國的分析並不真確，也過於一廂情願。第一波來到中國的洋人，自恃科技過人，以為中國人很需要他們，把中國過於簡化，以合於其目的，而無理解儒家思想道德結構的頑強頑，誤將敵意以為一時的悖常。我們佔了事後之便，遠眺湯若望、南懷仁所屬的年代，持平而論，中國人才是這場東西交流的受惠者。西方科技能用，則用之，也不吝報以珍寶官位，但僅此而已，與已無關之事，則冷淡以待。」⁶⁵

或是引用鮑羅廷在即將離開中國時，最後受訪的話：「鮑羅廷紋風不動，沉思良久，緩緩摸著短鬚，最後用低沉、壓抑的語調說到：『我前來中國是為了理想而奮鬥。解放東方人民，實現世界革命的夢想將我帶來此地。但中國本身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社會問題龐雜、無現的可能性，全都令我驚愕萬分，也將我淹沒期間，我的世界革命思想逐漸退色。在中國進行革命，為自由而奮鬥成為目的本身，不再只是達成目的的手段。我的使命是掌握形勢，推動巨輪前進，隨著時間的游移，巨輪也推著我一道前進。我自己成了這龐大機器裡的齒輪。』」⁶⁶而史氏認為：「這正是鮑羅廷的真心話，看得出他真有自知之明。中國左右了鮑羅廷，讓他認清這世上的事情是他和史達林無法一手控制的。中國革命有它自己的動能，雖然國、共兩黨均受惠於鮑羅廷的組織長才，但兩黨最後也都離棄了它。

⁶⁵ 史景遷，《改變中國》，037 頁。

⁶⁶ 史景遷，《改變中國》，218 頁。

」⁶⁷

甚至是提到魏德邁在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即將丟失大陸時給予其意見，然而蔣介石依然不聽勸的情形。史氏如此寫道：「難道中國政府不想打勝仗嗎？答案是：並不是沒有前提條件的。不能為了打勝，而把中國人的利害關係委由美軍來決定。不能為了打勝，引進民主制度，而可能制衡政府與官員。不能為了打勝，而與共產黨人合作，因為他們自有一套如何進行抗戰的浮誇觀念，共產黨人絕不會贊成『坐等勝利』的策略。」⁶⁸因為「中國不是美國，中國的戰爭必須按中國人的基本規則來打，而蔣介石則期盼能由他來制定這些基本規則。縱然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但這畢竟還是蔣介石的抉擇，況且蔣介石也有足夠的時間實現他的目標。無論有沒有羅盤，美國人都不可能在中國尋到他們夢寐以求的香格里拉。」⁶⁹

史氏透過這些西方人來華的例子，形塑出了一個概念，那就是——西方人不要想嘗試「改變」中國，因為最後等待他們的終究是「失敗」。也因此，史氏在結論寫到：「持平而論，這些人士的故事是警世教訓，而非鼓舞人心的宣傳。」⁷⁰而這樣的想法，明顯與後殖民主義者所呈現出來的悲情論調不同，因為史氏所呈現出的中國雖然在與西方互動的過程中受了苦，但實際上，中國才是這場中西交流中真正的受益者。

第五節：小結

史氏既不是中國威脅論者，也不是中國崩潰論者，但他透過他對中國的歷史性理解，把中國事物加以與複雜化，因而擺脫了西方長久以來可能對中國造成的簡化，再加上他重視中國自身的歷史脈絡，因此他認為西方所帶來的種種刺激及挑戰並不是主導中國變革的關鍵因素，而是來自中國內部本身。並嘗試告訴西方讀者，不要想要去「改變」中國，因為中國內部複雜的程度是連中國人自己都沒

⁶⁷ 史景遷，《改變中國》，219 頁。

⁶⁸ 史景遷，《改變中國》，302 頁。

⁶⁹ 史景遷，《改變中國》，303 頁。

⁷⁰ 史景遷，《改變中國》，319 頁。

辦法去控制其走向的，更何況是外來的西方人。

第三章：史景遷微觀視角下的中國

第一節：史景遷的「微觀」表現

觀察史氏的著作，可以發現大多數是屬於以微觀視角出發的書，例如《婦人王氏之死》、《曹寅與康熙》、《太平天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等，這些都是描述少部分人物或事件的書。但史氏在這些著作中，卻欲透過「微觀」的方式，來讓讀者認知到整體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背景，簡言之就是史氏想過來「微觀史學」的研究方式讓讀者達致有如「宏觀史學」下的理解。這點在史氏許多著作的前言中都有提及，例如在《曹寅與康熙》序言的開頭，史氏即寫到：「本書描述清史曹寅(一六五八至一七一二年)的生平，但這並不是一本傳記。本書試圖把曹寅的一生與他的時代構連，並給予制度同等的重視。所以，對我而言，重點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裡，某個時候的心情如何；重要的是，當我們在中國正史裡讀到曹寅是一個包衣、織造、巡鹽御史時，這意味著什麼。曹寅的所做所為自然要給予關注；但他可能做什麼同樣重要，或者，更精準地說，律例規定他應該做什麼，與曹寅同時代的人處在相同的官位時又會做什麼。」⁷¹

為了不讓讀者在閱讀其著作時出現因「微觀史學」而產生的「見樹不見林」之感，史氏在敘述時都會詳盡的描述各方面的細節，以這種方式來幫助讀者能夠獲得更全面、宏觀的理解。因此史氏往往在不重要的部分上特別認真，將篇幅著墨在細節或者是偏離主題的人或事物上。以下引用二段史氏在《太平天國》裡對於人物的描寫來證明史氏的這種手法：「兩個瞎了眼的女童，頂多不超過九歲，拿著木碗討飯，相互扶著走到廣場，她們雖然衣衫襤褸，光著腳，滿身蟲子，可她們依然有說有笑。」⁷²、「一位叫阿九的女人做的生意更是複雜，她向華人和洋

⁷¹ 史景遷，《曹寅與康熙》，序言，004 頁。

⁷² 史景遷，《太平天國》，022 頁。

人捐客或租或賣船隻，不但糖、食油和棉花買賣做得有聲有色，也把鴉片和火藥賣給海盜；她的情夫恩迪柯特(J. B. Endicott)船長擁有一艘買賣鴉片的美國船「魯帕雷爾」(Ruparell)號，阿九從他那而得到不少鴉片和火藥。一八四零年代，她在澳門以每年一百五十美元，向葡萄牙人租了一棟房子，好撫養她和恩迪柯特所生的孩子。她以每對一百三十美元的價格，向英國船長賒帳買了六響槍，用低價買了失事的船隻上泡了海水的鴉片。阿九能講幾句英語，她還蒐了一具倫敦考克斯(Cox)公司製的望遠鏡、一只吉璫·布雷內(Guinaud Brenet)製的銀表、兩架稱錢的天平、一管英式單筒獵槍。有次阿九在香港港口遇到英國巡捕，說要以走私及唆使搶劫的罪名逮捕她，她便從船上跳到一隻等在一旁的舢舨，安全脫逃。但若中國人要訛她的話——有人曾扣過兩艘她的船——那她就會威脅說她的「洋朋友」會來報復云云，最後那些人只好賠錢了事。」⁷³然而，在這段極為詳細地描述中的主人翁阿九卻幾乎完全跟《太平天國》一書的主結構沒有任何關聯，她不僅再也沒有被提到，甚至她跟此書中的主角洪秀全或其太平天國都沒有接觸過，她只是當時中國眾多河匪、海盜中的其中之一，她會被提及，是因為史氏在描述太平天國與海盜之間的合作與摩擦時，不僅詳述了太平天國與海盜的接觸過程，也順道介紹了其他在中國海盜的環境狀況。

另外，作家楊照在「浮華與蒼涼」系列講座演講中也認為，史氏除了在《前朝夢憶》中透過對於張岱生活細節的描繪，讓讀者體會晚明文人的生活之外，他在過去其他著作中也都有使用這種手法。⁷⁴

史氏這種將大量的真實細節堆疊起來的描寫方式，使得他在進行微觀描述時，還能夠盡量地顧及到整體社會的樣態，不會使讀者被某個事件或人物框架所侷限住，而是能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狀況產生更深層的了解，進而接近宏觀史學描述的樣態。

⁷³ 史景遷，《太平天國》，111頁。

⁷⁴ 楊照，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談史景遷《前朝夢憶》和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

第二節：史景遷描寫人物的特色

這或許與其中文字名字有關，「史景遷」三字，史氏曾說過是由「景仰司馬遷」一詞演變而來，而使司馬遷成名並流傳後世的名著是《史記》一書，其書是採用「因人繫事」的方式來構築歷史，也因此司馬遷需要常常發揮想像力來表達其筆下人物的各項性格特質，突顯在關鍵的時刻中，人物的性格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如何決定歷史發展的方向。因此假如沒有「想像」的幫助，在沒有辦法呈顯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得情況下，司馬遷是不可能去營造出宏偉的歷史場景的。以下舉出一段《史記》的內容來觀察司馬遷的這種手法。「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⁷⁵而這段極私密又大逆不道的談話是不可能會被記錄下來的，也就是說司馬遷是不可能得到有關於這句話的相關資料的，也因此，這必然是司馬遷在充分了解項羽的個性和為人處事的方法後，透過揣摩和想像其心理，最後呈現出來的人物形象。

因此史氏第一個特色就是「想像」，他有時描述人物的方式會類似司馬遷，利用「想像」來讓他所呈現的歷史情境更完整、生動。但史氏不僅如此，他運用「想像」的目的還有一部分是希望讓讀者能夠更了解人物的內心，讓讀者進到書中人物的內心世界中，運用所謂「移情」的方式來重建當時狀況，讓讀者能夠跳躍時空的限制，進而得知這些人物如何目睹、理解與經歷他們的生活，嘗試將過去起死回生。

史氏想讓讀者更了解人物內心的這個目的可以從幾本書看出，在《康熙自畫像》一書的序言中，史氏寫到：「本書是悠遊康熙帝國世界的導覽，他是西元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在位的中國皇帝。這趟遊歷之目的，乃是要揣摩康熙的內心世界：他憑恃著什麼樣的心理素質來治理中國？他自周遭的世界學到什麼教訓？

⁷⁵ 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

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什麼事能令他龍心嘉悅，又是什麼事情惹得龍顏勃然震怒？身為滿族征服者的苗裔，他如何適應於漢人的知識和政治環境，又是如何受到來京西洋傳教士所夾帶之西方科學與宗教思想的洗禮？」⁷⁶又或是在《太平天國》的序中寫道：「本書的用意在於提供一個排比有序的脈絡，來了解洪秀全的內心世界，並說明當他內心的想法和外在的脈絡合拍的時候，吾人便能追索他行為的邏輯」⁷⁷

而史氏用了三種不同的方式來嘗試達致此目的，第一種與「想像」無關，是透過節錄大量的私人日記、信件等，來讓讀者體會到書中人物的感受，因而進入書中人物的思想，這在《改變中國》、《前朝夢囈》、《利瑪竇》、《天安門》等書中都可以看到，可以說是史氏在呈現人物內心時的主要手法，這也是較沒有在史學界產生爭議的作法。

然而史氏卻有幾本書有著不一樣的表現方式，而另外的這兩種方式都引發了史學界的一些爭議。第二種方式主要出現在《婦人王氏之死》一書中，因為其書的主角王氏可能連寫字都不會，甚至更遑論要找到他的相關日記或信件了，因此勢必得用其他方式來呈現，而在這種特殊的個案中，史氏透過了對時間的抽換及引用《聊齋誌異》這本當時代的小說來構築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史氏在書中寫道：「我在他的許多面向中引據了三項：山東回憶的紀錄者、說故事的人以及形象的塑造者。在這一方面，他有時有令人想不到的優雅或力量。對我而言，唯有透過蒙太奇的形式，對這些形象做某些結合，才可能超越那個已逝的世界中的其他資料，更趨近王氏，表達出他在臨死前睡夢中可能有的一些想法。」⁷⁸

然而這種方式即引來了激烈的批評，中國學者黎優就認為：如果史學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想像來創作，那麼研究者就不必去搜尋第一手資料，遇到困難時只要充分發揮想像，就可編織起支離破碎的歷史之網了，而要是可以這樣寫史，那史

⁷⁶ 史景遷，《康熙自畫像》，序言，007 頁。

⁷⁷ 史景遷，《太平天國》，序言，009 頁。

⁷⁸ 史景遷，《婦人王氏之死》，序言，028 頁。

學的客觀標準將何在？⁷⁹而史氏將虛構的小說納入材料的方法其實也是一種「想像」的手法，只是其不是出自史氏的想像，而是原先小說家的「想像」罷了。雖然這些方式存在著大量的爭議，不過也唯有透過這種方式，現今的讀者才有辦法接近一位身處在十七世紀那個社會充滿動盪的年代中貧困農婦的心靈，並嘗試理解她可能會有的想法。

除此之外，史氏還有另外一種「想像」的手法，則是在其《康熙自畫像》一書中展現，在此書中史氏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來展現書中人物的內心，史氏寫到：「在風格、架構方面實驗良久以後，我決定透過康熙之口、以自傳體的形式來剪裁各項素材。不過，無論就統整我所蒐集到的零散資料，傳達康熙的率性而為，或勾勒他在公開及私下場合凝思中自我審視的起起伏伏，採用這種自傳體型態似乎是最佳嘗試。」⁸⁰但史氏的這種寫法即遭自汪榮祖先生的批評：「在史景遷的筆下，康熙居然自認『戰爭由其失算而起』(resulted from my miscalculations)，更沒有料到他接受吳三桂之乞退會逼其造反，『一切都是我的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 – for all of it – was mine)。如此代言，殊非史家傳神之言，而是小說家的想當然爾了。他又以康熙的口吻向施琅說：『朝廷上人人說你到台灣後會叛變，然而我認為非你不足以平台，我可保證你不會叛變。』(People at court all say you a rebound to rebel when you reach Taiwan. It's my opinion that unless you are sent to Taiwan it will never be pacified. You won't rebel, I guarantee it)。此向壁虛構的話，既不符中國政治文化，也不合史實，力薦施琅平台並保證不會叛變的是理學家李光地也。」⁸¹中國學者黎優也認為：此書雖有一定的文本依據，但基本上卻都是作者自己的主觀想像，而這種完全為傳主代言的做法，則是徹底模糊了作者與傳主間的界線，應該被歸類為「歷史小說」。⁸²

不過史氏這種透過「第一人稱」敘事的描寫手法，事實上好壞並陳，因為對

⁷⁹ 黎優，〈「史景遷熱」應休矣〉，《文學報》，2014年11月27日。

⁸⁰ 史景遷，《康熙自畫像》，序言，018頁。

⁸¹ 汪榮祖，〈三少四壯集-史景遷寫康熙〉，《中國時報》，2005年12月12日。

⁸² 黎優，〈「史景遷熱」應休矣〉，《文學報》，2014年11月27日。

於不熟悉中國文化背景的西方學生來說，《康熙自畫像》一書無疑讓他們對於中國皇帝的心理有了最直接的了解。也有人對史氏的如此手法有著正面的評價，龍小立就認為：歷史是不排斥想像的，而是要合乎語境、情理。史氏正是把握住這個關鍵原則，並用他獨特的宏大史觀加以結構，再用他優美的文筆加以敘述，於是歷史本身不僅得到了新的闡釋，也使歷史人物鮮活了起來。⁸³

第二個特色則是展現出人物的「能動性」。能動性(human agency)一詞指的是：在客觀限制性條件面前發揮經驗意識與主觀意向的能動能力。在這方面，史氏透過描寫書中人物在歷史過程中具有「選擇」的權力和機會來展現出他們的能動性。而史氏不愧是有著同時身為歷史敘事大師與暢銷書作家身分的人，他在展現人物的能動性時，不僅會呈現出這些中國人物所作的選擇，還會透過述說這些選擇的結果來引發讀者的同情心。因為人類的同情心機制並不是只要看到另一個生命存在就會自動開啟的，雖然一般人對於親朋好友或小嬰兒會燃起同情心，但要是對象是陌生人的話就不會如此容易了，還必須依靠著外力的催化才有辦法。然而，史氏的讀者卻大多數都是不了解中國的西方人。也因此他在描寫這些人物的能動性時，都會特別描寫這些人物為了解決問題或達成目標，而願意去接受選擇之後所產生出來的風險、危難的心態。這樣的方式，使得讀者與他書中的人物快速產生出連結，進而對中國或中國人開始產生興趣。

我們可以在《天安門》一書中，清楚地看到史氏的這種呈現方式，例如當史氏在描述聞一多為了鼓吹國人戮力推動國家改革，投入越來越多心力在中國民主同盟的工作上時寫道：「聞一多的同事提出忠告，說他的行事作風不恰當，會讓自己陷入險境，聞一多回答：『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們還要考慮到自己的安全嗎？我很感激。可是我還要做人，還有良心。』」⁸⁴而後在 1946 年，國共內戰再度爆發時史氏又寫道：「體恤聞一多的友人擔心他在緊張的政治世界裡恐遭不測，替他在加州大學謀得一份教職。縱然妻子和同事都百般央求他接受這份差

⁸³ 龍小立，〈從史景遷著作的水土不服說起〉，《文匯讀書周報》，2005 年 5 月 27 日。

⁸⁴ 史景遷，《天安門》，449 頁。

事，聞一多還是不為所動。七月十一日，聞一多在中國民主同盟的之交好友李公樸，在距他家幾街之遙的地方當眾遭到槍殺。聞一多堅持為李公樸舉行追思會，儘管有人警告他此舉無非只是義氣用事的魯莽行徑。」⁸⁵然而「聞一多親自蒞臨會場發表演講，他稱許李公樸的風範並挑釁槍殺李公樸的特務，乾脆連他也一起殺了罷。是日傍晚五時，當聞一多踏出民主同盟的報社時，有一群人走過街來向他們開槍，聞一多頭部中了三槍，倒臥血泊中當場斃命。」⁸⁶在這段描述中，史氏寫出了聞一多三次選擇的機會，然而聞一多的每次選擇，卻反而讓他更接近了危險的邊緣，最終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或是在描述秋瑾得知友人起義失敗後的行為表現上寫到：「秋瑾從上海報紙得知安慶事發，明知自身兇多吉少，卻仍拒絕逃離大通學堂。官兵也的確在七月十三日到了大通學堂，秋瑾與幾名學生仍試圖抵抗，但旋即被逼入死角就縛。秋瑾遭到嚴刑拷打，在七月十五日斬首。」⁸⁷以及描寫王實味就算遭到黨的威脅也不低頭的精神，史氏寫到：「五月二十七日起，亦即在毛澤東發表第二次演講的四天後，中央政治研究室召開連串會議，特別針對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等作品進行批判。到了六月初，會議的性質愈來愈像是群眾大會，常常有上千人出席。王實味被控犯了『政治跟隨藝術』的謬誤，並錯誤主張文學能夠彰顯人性的普遍面向。他提出退黨的要求，但拒絕修改他的理論主張，縱然牆上的大字報已點名他是托派分子，也在所不惜。而在六月十日，中央政治研究室責備王實味是個『隱性的托派分子』，並開除王的黨籍。從此之後王實味不再公開露面，據說他『專心致力於研究政治問題』。(二十年之後，毛澤東透露王實味在 1947 年時已被處決。)」⁸⁸在秋瑾和王實味例子裡，他們也都有著可讓自身安全的機會，然而他們卻還是不為所動地選擇了一個會讓自身遭遇危險的選項。

上述的這些行為，基本上都違反了大部分西方讀者在心中所認為「應該」作

⁸⁵ 史景遷，《天安門》，451 頁。

⁸⁶ 同上註。

⁸⁷ 史景遷，《天安門》，084 頁。

⁸⁸ 史景遷，《天安門》，441 頁。

的選擇，因西方價值較重視個人自身的利弊得失，然而這些中國人物的選擇卻都與西方社會價值下的理性選擇假設不同。史氏在此提供了文本，培養讀者熟悉另一種社會價值與條件下的理性，而讀者在自身認知遭到破壞的同時，自然在內心去找尋這些人行動的背後邏輯、原因，這麼一來，讀者和書中的人物就產生出了連結，史氏的目的也就此達成了。

第三節：史景遷筆下中國人物的特質

史氏筆下所寫過的中國人物眾多，不僅時代從十七世紀橫跨到二十世紀，其身分背景差異極大，上至統治者如康熙、雍正、毛澤東，下至貧農或百姓如王氏、胡若望。因此，如欲整理發現其筆下「全部」中國人都有的特質勢必會有困難，但如果稍微縮小範圍，我們會發現史氏筆下大多數的中國人物幾乎都是知識份子，或至少讀過點書，當然，除了《婦人王氏之死》中所描寫的少部分貧農。而既然史氏所關注的主體大部分都是中國的知識份子，那麼這些人所展現出來的特質，或許就是史氏所認為的中國人特質。

而史氏的《天安門》一書剛好就是其主要描寫中國知識分子的書，余英時先生在序中簡單介紹此書及就寫到：「史景遷想透過形形色色的知識人怎樣在這個大變動中自處以窺測其整體的趨向，在過去一世紀中，中國知識人一方面是激起巨變的一股原動力，另一方面又毫無例外地被巨變的浪潮所一一吞沒，這是中國史上空前甚至絕後的一場悲劇，但在雄偉悲劇的演出過程中，隨時隨地又透顯著無奈而自嘲的喜劇意味，史氏當然不可能把所有知識人都蒐羅在一部敘事之中，所以必須精選少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做深入的探討然後交織成一幅中國精神面貌的整體圖像。」⁸⁹

在《天安門》的序言中，史氏即有提到一些他想要展現出來的中國人特質，他寫道：「總體關照，書中人物的所作所為，展現出中國人在回應我們的時代危

⁸⁹ 余英時，〈《天安門》序〉。

機時如何富有彈性、如何充滿勇氣，又是如何靈巧敏銳。筆者期盼能以他們為例，生動的呈現成千上萬擁有類似才華和閱歷，但書中略去不談的中國人可能會有的行為模式：明知危險可期仍然義無反顧地投入某些政治行動；當希望渺茫時也不動搖；為了在分崩離析、殘酷的世界奮力求生，發揮純然的活力與冒險犯難的精神，所有這些特質反覆出現在筆者論及的中國人身上，或許有助於破除西方人積習已久的迷思，一掃認為中國人冷漠、短視的陳腔濫詞。」⁹⁰

因此，我們從史氏的序言裡就可以先得知一些他所想要讓西方讀者知道的中國人特質，像是勇氣、靈巧等正面意涵的特質。這可能是因為長久以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中一直有著膽小、怕事等負面特質。這在十八世紀中期英國的幽默雜誌《盼趣》(Punch)中刊的一首詩中即可發現：

「細眼如豬眼，髮辮如豬尾，老鼠加狗肉，海參配蝸牛，大火一快炒，全都上了桌；噁心中國佬，吃得咂咂響，狡猾中國佬，喝茶呼嚕叫，膽小中國佬，打仗就逃跑；英人好能耐，給他嚙厲害。」⁹¹

而史氏為了重新形塑西方人對於中國人的概念，他在描寫中國人物時，大都會如他序言所提，呈現出中國人展現勇氣或靈巧敏銳的樣貌，但如果把史氏所描繪出的中國人行為都稱之為特質，則又顯得太籠統、模糊，而喪失了「特質」這兩個字的意涵。然而就在筆者分析這些人物行為展現的背後動機之後，則發現這些人物在某方面有著極大的一致性，那就是這些人物皆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心態。換句話說，史氏想要展現中國人的「勇氣」，但「勇氣」的產生有很多種原因，每位人物產生「勇氣」的背後動機並不相同，但如果我們把展現勇氣而欲達致的「目的」分成兩類的話，可以分為一類是為了追求個人利益而產生出的勇氣，如為了升官發財而奮勇殺敵；另一類則是為了追求公共或國家利益而產生出的勇氣。而仔細審視史氏筆下所描述的中國人能夠產生勇氣的原因，會發現其實都是因為這些人都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和胸懷，他們都希望著國家能夠更富

⁹⁰ 史景遷，《天安門》，020 頁。

⁹¹ Raymond Dawson.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33.

強，百姓能夠過著更和樂的生活，進而願意放棄自己的某些利益，或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以下舉出史氏在《天安門》一書中描寫人物的段落來證明這個觀點。

史氏在形塑丁玲形象時寫道：「就算黨中央委員會頒布指示，國際婦女節的慶祝重點應置於宏揚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促進中國的團結，頌揚女性在革命中的積極角色。丁玲卻自有定見，不理這些指示。她在《三八節有感》一文中寫道，女性在延安的處境或許真的好過中國其他地方，但也毋須過度羨慕，事實上，女性仍舊過著艱難的生活，因為周遭的男性持雙重標準。」⁹²而後「丁玲繼續寫道，特別諷刺的是在延安的社會，女性在各種壓力下被迫放棄黨務工作，去結婚、生兒育女，還被諷刺是『回到家裡的娜拉』；假使她們每週一次把嬰兒托給臨時保母，出去跳舞，全世界的人就會開始說長道短。有些已婚女性不想有小孩而去墮胎，或者聘僱全職保母以便能重返政治崗位；她們若真如此做，就會被斥為『落伍』。離婚也行不通：男性要離婚輕而易舉，換作是女性提出離婚之請，總是遭到非議。根據丁玲的說法，女人的命運，無論她是否『落伍』，生活的自然鐵律牢不可破，只是換個說法以表明她們活在現代，在文章的中段，丁玲呼籲黨對女性問題採取寬容態度。」⁹³然而「幾個月後，據說毛澤東取消丁玲拍團體照時的榮譽席位，撂下一句雙關語：『我們不要在三月八日那天又被指責了。』」⁹⁴從這段論述中可以看到，史氏筆下的丁玲展現出的勇氣並不是為了能夠讓自己在中國共產黨內扶搖直上，而是為了追求整體女性在中國的平等地位。也因此，就算面臨到黨的壓力，她仍不為所動地重申女性主義論述的需要，為著全中國的女性而奮鬥。

或是史氏在介紹沈從文時，引用了他 1948 年寫給一位曾經就教於他的青年學子的信，信中勉勵學生努力開創新社會：「目前這個政府，在各方面癱瘓腐朽

⁹² 史景遷，《天安門》，435 頁。

⁹³ 史景遷，《天安門》，436 頁。

⁹⁴ 史景遷，《天安門》，437 頁。

了，積重難返。...我們這一代的文人，從『五四』時候起，握著一隻筆，抱著『科學』與『民主』精神，努力了二三十年，在文化工作上，也算是盡了力量。以後的新社會，還待你們青年朋友努力開創。不管政治怎樣演變，新國家的建設，總要依靠你們誠懇踏實的青年人。你問起時局，是不是有走動的意思？照我看來，逃避也沒有用。不過既然留下，就得下決心把一切從頭學起，若還是像從前一樣，作小書呆子，終究不是辦法。」⁹⁵在這裡可以得知，在史氏筆下的沈從文明知國家已併入膏肓，但他仍然孜孜念念在國家興亡上面，還不忘提醒後輩開創新的社會環境，可以看出沈從文也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

或者在史氏提及康有為時，史氏寫到：「康有為潛心博覽經史數載，至弱冠之年，已蘊育出一身必能有所立，天下必有可為之處的自信，可『超然立於群倫之表』，『與古賢豪君子為群』，也開始相信自己注定是繼往開來的聖賢。1877年康有為一心敬畏的祖父意外溺斃，於是轉而鑽研佛經，觀想功夫精進：『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間，極苦極樂，皆現身試之。使則諸魔雜沓，繼則諸夢皆息神明超勝，欣然自得。』這種自得也讓康有為的社會責任感漸增：『既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智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志。』」⁹⁶並更引用康有為在1904-1910年間周遊各國而至耶路薩冷的哭牆旁，因同感人類的悲苦，並想到弱小或分裂國家的處境，而中國亦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步上後塵時，想到自己未竟之志而所寫的詩：

「築者所羅門，於今三千年。城下聚男婦，號哭聲咽闐。日午百數人，曲巷肩駢連。憑壁立而啼，涕洟湧如泉。

珍寶移羅馬，痛心亦難諱。正當吾漢時，渺茫何足云。吾國兩千載，亡國破京頻。劉石亂中華，洛陽慘風雲。

吾未免為人，多請猶為牽。吾唯有國故，身家頻棄捐。哭弟哀友生，柴市理冤云。枯墓已不獲，先骸掘三墳。

⁹⁵ 史景遷，《天安門》，481頁。

⁹⁶ 史景遷，《天安門》，023頁。

國籍不能棄，大鑿不能穿。猶是中國人，臨睨蓋鄉園。眇眇涕被席，耿耿傷我神。願告愛國者，猶太是何人。」⁹⁷從這些史氏對康有為的描述，讀者可以很明確的感受到康有為以天下為己任，欲救國救民的想法。

又或是在史氏形塑徐志摩時，他引用了徐志摩寫給恩厚之的信，此信是徐志摩在越來越了解中國的狀況時所寫的：「這裡所見的不是高貴而是卑鄙，不是友誼合作，而是敵意和相咬相告；不是朝氣勃勃的原則，而是僵化害人的教條；這一切都像行屍走肉，到處為患，要把整個國家帶進更大的難，也把人的靈魂中創造泉源閉塞了。現在有些省分已經淪為民生極度凋敝的人間地獄。我親眼看過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北方，每一念及那邊的情形，我的血液會驟然變冷。那些餓得不能人形的孩子真的會為地蘚青苔而打鬥，只要他們瘦骨嶙峋的雙手能在石縫中挖到一點點，就立刻往口裡送。這種不顧死活的生之掙扎，無非為要減弱一下飢餓與寒冷帶給他的痛苦。唉，為什麼老天爺讓他們生在這世上呢？」⁹⁸照理說此信中的中國已被徐志摩形容成人間煉獄，自然是難以改變或拯救，但史氏心中所認為的徐志摩是不會因為這種事情被擊倒的，史氏繼續寫道：「然而，他還是沒放棄寫作，時而是死亡的幽冥與壯麗式隱喻，時而是翱翔之樂的夢幻隨筆，令人憶起他初讀丹農雪鳥(D'Annunzio)作品時寫下的『有如大海的波濤，在寂靜的天空中嘯吼著無窮的奧義；有如雲，包捲大地』，他急欲走進夢中『飛上天空去浮著，看地球這彈丸在太空裡滾著。』」⁹⁹從這些史氏對徐志摩的描述來看，徐志摩也同樣有著欲拯救天下百姓的想法。

而在史氏其他的著作裡，關於描寫統治者的書就不用多說了，畢竟在中國傳統的概念下國家與統治者並無二致，自然會有這樣的想法，而一些如曾靜、洪秀全的謀反之輩，也都是感到當下的國家的災難，例如《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裡的曾靜勸岳鐘琪謀反的原因就是因為：「『土地盡為富戶所收，富者日富，貧者

⁹⁷ 史景遷，《天安門》，110 頁。

⁹⁸ 史景遷，《天安門》，340 頁。

⁹⁹ 史景遷，《天安門》，341 頁。

日貧。』且雍正弑兄屠弟；謀父逼母；懷疑誅忠；雖富有四海、府庫充盈，確十分貪財；性喜好殺，酗酒成性，縱情淫色，無怪乎『天震地怒，鬼哭神號』。¹⁰⁰洪秀全則是認為在「清妖」所控制底下的中國生靈塗炭，而欲解救眾生才起而革命。

因此，雖然史氏筆下中國人展現出來的行為都不相同，有的要維護清廷，有的要創造共和國，有的用武力革命，有的則要用文章救國，但如果幫這些人物行為做統整、歸納的話，則可以發現「以天下為己任」的心態幾乎貫穿了史氏著作中每位中國知識份子的行為，這或許可稱之為史氏筆下中國人的真正「特性」。而這「特性」，史氏卻又沒有在書中明言，這有兩種可能的原因，一是史氏不希望點破讀者，而是想讓讀者在閱讀中淺移默化的形成他們對中國人的認知；二則是這其實是史氏隱藏在自己內心中對於中國人印象。

第四節：小結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史氏欲透過他對中國細節的描述，來讓讀者更了中國，不論是在政治、社會還是文化方面，雖然因此在寫作手法上遭受到一些非議，但也因為他這樣的特殊敘事手法，讓讀者更了解人物內心，並成功的讓讀者找回對於歷史的興趣。而這在史氏所身處的那個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二十世紀後半，也就是史氏出版大多數著作的年代，當時的中國才剛剛崛起，多數的西方人對於中國或中國人往往都是一知半解的，其中甚至還包含了很多錯誤的認知和想像，而史氏的著作正幫助西方人了解這個正在崛起中的國家，也許正是這樣的方式，中國因此避開了許多可能因誤解而產生出的衝突和摩擦。

¹⁰⁰ 史景遷，〈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019 頁。

第四章：史景遷與後現代歷史學

常有人稱史氏為後現代史學家，不過他並不承認，並說出：「也許是，也許不是」¹⁰¹這樣的話。因此本章透過比較史氏的作品與後現代主義的差異，來理解史氏為何會說出這樣的答案。然而，後現代主義不僅極難被定義，且涉及的範圍很廣泛，電影、文學、建築、藝術等幾乎都可以看見後現代的身影，不僅如此，每個人對後現代的理解也都不太相同，學界也爭論許久，因此本章並無意對後現代做太多的介紹跟分析，將僅簡單陳述一下後現代主義出現的原因及對歷史學的影響，而將重點放在探討幾個史氏有涉及到的後現代主義特徵上。

第一節：近代歷史學的樣貌

這得從十七世紀開始說起，十七世紀是歐洲自然科學大步發展的時期，而自然科學的每一次變革，都直接影響了人們的思想意識，從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的日心說開始，到培根(Bacon 1561-1626)的歸納法與笛卡兒(Descartes 1596-1650)的演繹法，這些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出現，對於十七、十八世紀對歷史觀念的影響甚巨，因為這些科學方法論使人們了解到自然界有其規律，而既然自然界有其運動規律，那人類社會應該也會有，於是當時許多思想家便以此為目的，想要去發現人類社會之間的規律，像是當時許多人就都在探討國家形成的由來。

例如霍布斯(Hobbes 1588-1679)在其最出名的著作《利維坦》中假定人類社會發展之初是「自然狀態」，每個人都有其「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去滿足自己的生存需求，基於這種自然權力，人與人之間會處於敵對狀態，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顧他人死活，然而這樣的自然權利卻不利於全體人類的生存，於是人們感到必須結束這種戰爭性的自然狀態，因此每人都放棄一些自然權利，來達成某種契約，進而形成國家。而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雖然也認為自然法是社會存在的基

¹⁰¹ 盧漢超，2005，〈史景遷談史〉，《史林》，第2期。

礎，但與霍布斯不同的是洛克強調人之間的平等，即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獨立的。透過「理性」這個自然法的概念，人們就能理解為何他們必須尊重其他人的權利，包括了尊重他人經過勞動而獲得的財產的權利，但人們長期生活在自然狀態中，總會感覺有不便之處，特別是在處理財產糾紛時，因此有必要把自然法權威化，締結某種契約來建立一種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

這些不同的政治社會學說，反映了他們對於社會現實和歷史演化的認識，雖然他們論述的重點是在闡述一種新的政治理論，但他們的理論在許多方面都涉及了歷史，這種歷史哲學摒棄了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神祕、宗教因素，而欲在人類自身活動中解釋社會的發展和其政治形式。他們企圖像自然科學家那樣，從觀察和分析事物現象中尋求規律性的認識，而這種想法也連帶影響了歷史學。

譬如生長在十七世紀後期的喬瓦尼·巴蒂斯塔·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44），他認為歷史是人們理解自身的最好手段，因為歷史本身就是由的人行為構成的，是以他想創建一種人類世界的科學，維柯寫道：「在距離我們那麼遠的最早之古代文物沉浸在一片漆黑的長夜之中，畢竟毫無疑問地還照耀著真理之永不退色的光輝，那就是：文明社會的世界確實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它的原則必然從我們自己的人類心靈各種變化中就可找到。任何人只要就這一點進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驚訝，過去哲學家們竟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這個自然世界竟然是由上帝所創造，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過去哲學家們竟忽視對各民族世界或文明社會的研究，而這個文明社會既然是由人類創造，人類就應該希望能認識它。」¹⁰²維柯的這種想法，存在著一個思考前提，那就是——他相信人類普遍具有「理性」，因為必須如此，後人才有辦法去理解和解釋前人的行為，這也正是歷史學的科學基礎。

自然界的規律更是在牛頓(Newton 1643-1727)提出的萬有引力之後廣被世人知曉，因為這定律解答了宇宙行星的運動及其一切與之相關的運動現象，使人類

¹⁰² 黃文斐，維柯《新科學》之中古性，19頁。

更加認識了自然以及其運動規律。因此到了十八世紀，社會學家們信心大增，認為既然科學家能揭示和解釋自然界的規律，那麼人類社會的規律自然也能被揭示跟解釋，畢竟人類普遍存在著「理性」。

由於啟蒙運動思想家相信普遍理性的存在，他們便認為人類社會必將遵循一定的規律發展進步，雖然因每個社會的不同也許節奏快慢上有所差異，但都必須經歷相似的歷史發展階段，憑藉著理性，人們將能理解人類過去的歷史，甚至還能預測人類的前景，因此歷史學家的任務，除了陳述歷史事件之外，還必須嘗試發現和描述歷史的意義。王晴佳教授就認為：「總的來說，自十七世紀以來，西方歷史思想中洋溢著一種進步、樂觀的氣氛，大多數思想家認為，由於「普遍理性」的發現，人們的知識和才智得到了啟蒙。人類在認識自然和自身上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而知識的進步和科學方法的運用，將會帶來整個社會的進步，人類的未來因此一片光明。」¹⁰³

而十九世紀初的歷史學家總結歷史的方法是採用一種目的論(Teleology)的方式。例如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就認為像是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凱撒(Julius Caesar)和拿破崙(Napoleon)這樣叱吒風雲的人物的豐功偉業對世界歷史的走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又或是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不像黑格爾那樣重視個人的作用，但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某些歷史事件，如對法國大革命特別看重，認為它是開創新的歷史時期的標誌。¹⁰⁴到了十九世紀後期，有一些人則開始對黑格爾、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目的論」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近代歷史學之父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他認為歷史學家應該要不帶偏見、目的地如實陳述歷史事實，因為他認為歷史背後有人所無法真正理解的意義，即上帝的意志。他的名言就是：「客觀如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因為如果史學家做到這樣的話，讀者就能自行從中體會上帝對人類歷史的安排。¹⁰⁵

¹⁰³ 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念》，149 頁。

¹⁰⁴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76 頁。

¹⁰⁵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78 頁。

由於蘭克決定讓事實說話，因此他十分強調歷史史料的收集與整理，他認為只有從原始的材料中，才能發現歷史人物的真正動機，之後歷史學家才能加以解釋。在他來看，最可靠的史料就是政府的檔案及私人書信等類型文獻，如官員報告、官署文件、私人文件等，然而官方資料也就代表著與政治、外交有關，就連私人信件也不例外，因為當時能夠有機會受教育識字者大多也都為官僚人士或至少身為上層階級。¹⁰⁶這樣的結果則剛好與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者的作法不謀而合，因為他們最後都只關注於他們認為重要的歷史，差別只在於對於何者才是重要的事情上存有分歧罷了，因此，蘭克雖然與黑格爾的觀點不盡一致，但他們在根本上卻是一樣的。

是以近代歷史學事實上就是在上述幾項前提認知之下所展開的，第一項前提是：認為人類歷史內部如同自然一樣，存在著「規律性」；第二項前提則是：相信人類普遍存在著「理性」，因此歷史學家有辦法藉由觀察人類的過去而去預測人類的未來。而這兩項前提又造成了兩種不同的近代歷史寫作現象，一是：認為歷史學家應客觀的陳述歷史，做到「客觀如實」；二是：只關注於特定的人物或事件。然而，這兩項前提在二十世紀開始被後現代主義批判，因而造成後來歷史寫作的方法也為之改變。

第二節：後現代思潮的出現及批判

後現代思潮的出現跟二十世紀初的科學革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普朗克(Planck 1858-1947)的量子論、愛因斯坦(Einstein 1879-1955)的相對論等科學新理論的出現，都衝擊了舊的科學觀念，量子力學更是取消了經典物理學嚴格的因果關係。此時物理學的革命已經展現了自然現象中的不確定因素，並開始用概率來代替了嚴格的因果論，慢慢地改變了人們原先對事物擁有發展規律的看法，人們開始懷疑自然界是否有其規律性，而如果連自然界都不一定有其規律性的話，那

¹⁰⁶ 麥勁生，《近代史學與史學方法》，24 頁。

人類社會也就不必然擁有規律性了，這一系列的問題不斷困擾著當時的人們，使得歷史學家更難以去證實人類歷史的規律。誠如法國學者馬夏爾在《科學方法與經驗學》中所總結的那樣：「如果連所謂精密科學都失去了決定論的嚴格準則，那麼它們在那些永遠不能求得精密的科學中又怎能保存呢？」¹⁰⁷

如此一來，近代歷史學的前提認知，即歷史內部存在「規律性」的概念便遭受到了挑戰，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 1902-1994)就認為歷史不存在所謂的「規律」因為歷史是一個單一事件，沒辦法如自然科學般受到繁複的檢驗，他說道：「地球上的生命進化或者人類社會的進化，只是一個單獨的歷史過程。我們可以認為，這樣的過程是遵照各種因果規律(如力學定律、化學定律、遺傳與分異規律、自然選擇規律等)進行的。然而，對進化過程的描述不是規律，而只是一個單稱的歷史命題。普遍的規律，就像赫胥黎(Huxley)所說的，是對某個不變秩序的斷定，即對某一類的所有過程的斷定。況且，儘管沒有理由說對個別情況的觀察不會促使我們從中提出一個普遍規律，但也沒有理由說我們即使走運也不會碰上真理。但是，很明顯，任何規律無論它是用任何方式提出，在它被科學認真的認可之前，都必須由新的情況來檢驗。可是，如果我們永遠只限於觀察一個獨一無二的過程，那我們就不能指望對普遍性的假說進行驗證，不能指望發現科學所能接受的自然規律。對一個獨一無二過程的觀察不可能幫助我們預見它的未來發展。」¹⁰⁸

除此之外，也有人藉由改變看待歷史的時間觀念來挑戰認為歷史具有「規律性」的概念，他們認為原先的歷史研究會認為歷史存在「規律性」，是因為之前的歷史研究突出了時間的順序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後歷史學家們再透過敘述的排列組合，才把這些原來關係不大的事件巧妙地聯繫在一起，進而才歷史形成一種環環相扣「規律」。例如伊麗莎白·鄂摩斯(Elizabeth Ermarth 1939-)就認為歷史的時間應該是一種韻律的時間(rhythmic time)，而這韻律的時間所表現的

¹⁰⁷ 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念》，242 頁。

¹⁰⁸ 波普爾(Popper)，《歷史決定論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85-86 頁。

是時間的豐富和多元性；時間的演變不再是單一路徑的，而是有多種枝節、多條叉道並同時進行的，因此這種韻律的時間能表現出歷史過去的各种細節，就此擺脫單一的「規律」。¹⁰⁹

王晴佳教授就認為：「這種對原來時間觀念的否定，其實也就是否定西方近代文化的一個思想基礎。因為從本質上來說，後現代主義就是對西方文化的反叛，而西方近代文化的成就，恰恰是依靠歷史學而得以建立和傳播的。西方文化的一些讓人感到理所當然的概念，比如科學可以揭示真理、歷史必然走向進步及其延伸、現代化理論等，都是透過歷史寫作得到普及的。易言之，西方歷史學家通過對西方歷史的描述，闡述了這些觀念的產生和其淵源，然後再為其他地區的人們所吸收。因此想要反對近代歷史哲學，即「大寫歷史」，後現代主義者必須反對西歐中心論，更反對用這些原先產生於西方的概念所描繪的世界歷史。」¹¹⁰

除了藉由上述兩種方式來挑戰歷史具有「延續性」這樣的假設以外，也有人挑戰傳統近代史學的另一個假設——「普遍理性」，如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他在其著作或研究中用了不少的例子來否定啟蒙運動以來所推崇的理性主義，例如他在他的名著《瘋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這本描述西方人對於瘋狂的看法和演變過程的書中，透過對於瘋人院的調查，證明了理性主義的興起使得人非理性的部分遭到嚴重的壓迫與欺負。他認為自啟蒙運動以來，醫生漸漸地被神化了，因為他們有權決定讓誰進入醫院，以及決定如何在醫院中進行治療，他們以科學和理性的名義壓制不合理性秩序的一切。然而這些行為，在傅柯看來，只不過是知識和權力的偽裝，都是一種企圖用抽象概念來壓制思想自由的作法。¹¹¹

到此，傳統近代史學的兩項前提假設都已受到攻擊，自然有人開始挑戰傳統史學原先在這兩項前提假設之下對歷史的認知，即開始質疑歷史學家是否真能如

¹⁰⁹ Elizabeth Ermarth, 《Sequel to Hi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al Time》, p. 47。

¹¹⁰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 84-85 頁。

¹¹¹ 楊大春,《傅柯(Michel Foucault)》, 088-90 頁。

蘭克所說的「客觀如實」來描述歷史。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看來，歷史學家的「歷史寫作」與「真實的歷史」是不同的，歷史學家並不是事實的收集者，而是「能指」(signifier)的收集者和整理者。他認為，因為歷史學家必須使用語言來研究和寫作歷史，所以歷史學就包含了三個方面，分別是「能指」或譯「意符」(signifier)、「所指」或譯「意指」(signified)與「所談」(referent)。這個「所談」也就只是通常意義上的歷史過程或事件。但是為了表示歷史的「客觀」與「真實」，近代歷史學省略了「能指」與「所談」之間的「所指」，而將「所談」與「所指」等同，這才使得歷史寫作看似等同於歷史的真相。¹¹²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 1928-)更是否認了歷史的真實性，他在《史元》(Metahistory)一書中認為歷史與文學創作一樣。其書的副標題是「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The History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想像」這一詞即點出懷特的用意，在他看來，歷史與文學一樣，需要透過「想像」，因此必然不可能是完全客觀的。他在《史元》一書的序言即寫道：「藉揭示一切歷史理念均立基於語言學，筆者刻意擬為史著不可豁免之詩學本質奠立基石。同時亦特別申明，凡是史著，其理論概念莫不寂然隱含於其預鑄元素之中。」¹¹³他認為，歷史學家在整理史料時，已經在腦海中「預設」(prefigure)了他想研究的範圍以及他將如何使用他所蒐集到的史料來獲得的結論，這種「預設」的表現形式主要體現在作品的風格上，也即語言的形式上。因此歷史學家與哲學家、文學家一樣，都是用一種寫詩的方式在處理材料，歷史寫作是一種具有「詩性」(poetic)的工作。因此他將這四種語言形式做了四個方面的歸納，有隱喻(metaphor)、換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和諷喻(irony)，而這些方式都是以前人們用來分析詩篇的，懷特用這種方式歸納歷史，就等於是把歷史寫作等同於一種不自覺的詩詞創作。¹¹⁴簡言之，就是懷特把歷史寫作看成是由語言、藝術、文學的構成，因

¹¹²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110 頁。

¹¹³ 海登·懷特，《史元》，序言。

¹¹⁴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203-204 頁。

此必然不真實。

與此同時，也因認為人類普遍存在著「理性」的想法以及認為歷史內部存在著「規律性」的想法都已被破除，是以歷史學家們就沒有必要再汲汲營營於過去的歷史，並期望從中發現人類的「未來」，這使得人們開始從各種角度開始觀察歷史，以前如黑格爾、蘭克那種只注重英雄人物或特定事件的寫作方式已漸漸不再被人贊同，許多以前被忽略的歷史，如婦女史、底層人物史以及被殖民國家的歷史等的「他者歷史」都慢慢地開始受到重視，歷史學家們開始從許多不同的角度觀察歷史。

如卡羅·金茲堡(Carlo Ginzburg 1939-)的著作《乳酪與蛀蟲》就是探討十六世紀磨坊主的宇宙觀，他透過描述磨坊主與宗教裁判的審訊過程，讓讀者可以體驗到當時人的生活與思想。或如喬瓦尼·列維(Giovanni Levi 1939-)在《繼承權力》(Inheriting Power)一書中透過教堂記錄、公證法案等，來描述一位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巫師生活。而後更出現所謂的「日常史」，他們研究的對象不是個別的人物，而是社會的團體或階層，例如他們以前工業時期的農民家庭為對象，揭示該時期手工業坊如何改變農民的生活，以及家庭人口、成婚的年齡、工作習慣的改變等等。而這些研究的特點則是一一他們都把研究的重點轉往原先歷史研究中的「它者」。

透過上述的介紹，我們可以大致得知後現代主義對於歷史寫作的影響約莫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否定近代歷史學想要去探尋人類未來的觀念，即否定「大寫歷史」；第二、把關注轉往在原先在近代歷史學中的「它者」，即婦女、底層人物、日常史等；第三、企圖取消真實與虛構、歷史與文學之間的界線。

不過筆者在此要提特別提醒的是，上述這些人物雖然都帶有被稱為「後現代」的行為概念，但他們卻不一定都承認自己是後現代主義者，例如金茲堡便堅決反對後現代懷疑論者從語言學角度向歷史學發起的批判。¹¹⁵

¹¹⁵ 關於金茲堡的詳細概念，可見於 2013 年大陸學者李根的博士論文《論卡羅·金茲堡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第三節：史氏著作與後現代史學的差異

史氏的全部著作中都充滿了三個特點，首先是、史氏非常注重細節的描繪，這點筆者在第三章裡即有引用《太平天國》裡的部分段落作介紹，在此不再贅述，而史氏這樣子的作法使得他帶有了一些後現代色彩，因為史氏所注重的這些「細節」，也就是原先歷史所不重視的「它者」；第二項特點是、史氏在每本書中，並沒有完全按造時間的順序進行描寫，而是以他所設計的結構去完成整部著作，也因此讓人有蒙太奇般的時間交錯感，而這也是後現代的特色；第三項特點是、史氏在每本書中都用了大量的史料，不論是用來輔助自己的觀點，亦或是更精確的呈現出當時狀況，而在這點上史氏自然是屬於傳統近代史學的觀念。而以上這三點，是史氏的著作的「通則」，因此特別先提出來讓讀者知曉。

接下來，筆者將簡單介紹一下史氏的著作，並嘗試分析他的著作中不屬於「通則」的部分，並判斷其是屬於傳統近代史學的觀念還是屬於後現代史學的觀念。分析分成三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觀察其著作中是否有想要尋找某種「答案」或「規律」，如果有的話則是屬於以蘭克、黑格爾為主的傳統近代史學觀，如果沒有，僅是描述而不下結論的話，那即是帶有後現代主義色彩。

第二種方式是：觀察其著作中主要描述的對象是誰，如果是屬於一般人耳熟能詳的大人物、事件，即是屬於傳統近代史學，但如果是以前常被忽略的部分，如婦女、小人物、或不重要的事情，那就屬於後現代主義的史學觀。

第三種分析方式是：觀察史氏的「描寫方式」，如果是屬客觀、不帶偏見，力求反映真實的話，即屬於傳統的近代史學，但如發揮史家的主觀想像、使用有爭議性的史料、抽換時空觀念等類文學的手法時，則就屬於後現代主義的史學觀。而著作介紹的順序將依照史氏出版的先後順序，藉此理解他每一時期的轉變。

史氏的第一本著作是《曹寅與康熙》(1965)，這本書也就是他的博士論文，

如史氏在序言所述，此書的重點並不是曹寅或是康熙，他主要是想透過描述這兩人之間的互動過程，勾勒出當時的社會環境，如滿人的旗制、密摺制度如何形成、織造、巡鹽御史的工作等，並沒有要嘗試找到某種「規律」或「結論」。因此以第一種分析方式來看，此書是屬於後現代的歷史觀；而在觀察對象上，他描寫的對象雖然除了帝王之外還有如曹寅、李煦等官吏，但主要也還是以統治階級為主，因此屬於傳統近代史學觀；另外在描寫手法上，史氏主要還是依據各種官方的檔案、奏摺等來作為他描寫的依據，並沒有太多作者主觀的介入。

第二本是《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1969)，這本書主要是介紹十六位來華洋人的過程和經歷，但史氏在書中給了讀者一個「答案」，那就是西方人在中國總是會失敗，得不到其想要的。這點史氏不僅在每個章節都有穿插，並且在結論裡也有提到，因此以第一種分析來看，是屬於傳統的近代歷史觀，因其想要去給出一個「結論」；而在觀察對象上，由於人數眾多，有較有名的西方人如湯若望、南懷仁，也有較不知名的如華爾，因此第二種分析法在此書較不適用；而在寫作方式上，史氏在書中引用許多私人的書信、日記等資料來反映出他們的想法，並沒有太多的主觀補述。

第三本是《康熙自畫像》(1974)，這本書是史氏以第一人稱的手法，來描寫康熙一生的內心世界，以第一種分析方式來看，他並沒有想要去找什麼「慣例」或「規律」，只是想單純呈現出皇帝的想法，因此屬後現代主義的概念；而觀察對象既然為皇帝，無疑是屬於大人物，因此屬於近代傳統史學的觀念；但在描繪手法上此書則充分顯現出後現代主義的特色，因為第一人稱即代表著主觀的「想法」和「想像」。

第四本為《婦人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1978)，這本書主要內容是描述發生山東偏僻小鎮及其中一位農婦的故事。史氏在序言中提到，他是想讓藉由這些發生的故事，讓讀者更了解當時中國農村的狀況，也因此這是一個僅「描述」而沒有給出「結論」的書，是以屬於後現代的史觀；而他觀察的對象

是一位連全名都叫不出來的「王氏」，自然屬於小人物，無疑屬於後現代的史觀；在描寫方式上，史氏為了呈現出王氏的內心世界，竟在材料的選擇上使用了被歸類為小說的《聊齋誌異》，這使得整本書充斥著妖狐、法術、刺客等「想像」，也因此讀起來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完全體現了後現代主義的精髓。

第五本為《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1981），這本書是以九位中國的知識份子為經緯，並輔以許許多多的人物來呈顯出中國的近代政治、社會變化。史氏在序中提到：「書中訴說個人故事的中國人，都不是左右近代中國歷史的政治領袖。儘管不免論及國民黨的領導人孫中山、蔣介石，以及共產黨的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但筆者個人偏好的關注對象另有其人，雖然他們的生命在革命進程中並非光彩奪目，還是以其獨特的敏銳度描繪自己的希望和悔恨，同時其個人閱歷也有助於界定他們經歷的時代特質為何。」¹¹⁶因此以第一種分析方式來看，是屬於傳統近代史學概念的，因為他嘗試找當時代特質這一「結果」；雖然史氏主要關注的對象是政治領袖之外的其他人，但其也並不像「王氏」那樣是屬於默默無名的小人物，主要敘述的三人分別是康有為、魯迅、丁玲，這三人雖不是領導者，但也絕非小人物，他們的生活都涉及了強烈的政治問題，因此筆者傾向把他們當成是重要人物來看待；而在描述方式上，史氏則使用當事人的許多私人信件和日記來反映他們的想法，並無太多主觀的描述。

第六本為《利瑪竇的記憶宮殿》（1984），這本書透過對於利瑪竇生活的描寫，呈現出中國及歐洲在十六世紀末所發生的種種事情，其中有不少是圍繞著宗教因素。因此以第一種分析法來看，此書同樣不帶「結論」，而是以描述為主，屬於後現代主義的範疇；而在觀察對象上，筆者傾向把利瑪竇當成大人物，畢竟他是西方第一位到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人，之後來到中國的許多西方人很多層面上都受利瑪竇的影響，不論是對中國的想法、處事方式等，是以第二部分還是屬於傳統的近代史學觀；而在寫作方式上，史氏沒有太多主觀的介入，他對於利瑪竇的

¹¹⁶ 史景遷，《天安門》，018 頁。

每個說法跟行為，都輔以相關資料佐證，

第七本為《胡若望的疑問》(1987)，這本書是描述在十八世紀初，一位中國人到歐洲所發生的事，此書同上一本《利瑪竇》一樣是屬於一本東西交流的書，只是雙方互換位子了。此書一樣不帶「結論」，僅呈現東西交流所產生的現象，是以同樣屬於後現代主義的表現；而從史氏在書中的序言，亦可窺知其另外兩個部份的看法，史氏說到：「關於胡若望，最令人驚訝的或許就是我們竟對他瞭若指掌。中國的傳記傳統在材料上是很豐富的，他保留了有關學者和政治家、哲學家和詩人，正直清廉的奇人異事和特立獨行的隱士之傳記材料。縱使是商賈和武人，只要他們能富而好仁，以及勇猛善戰或平定內亂，亦可能載及史冊。但胡若望卻是毫無可載之事蹟。他是個令人惱怒且顯然惹人厭者；他一文不名，無顯赫親戚，又才疏學淺，僅能抄寫他人的文稿。他只有勇氣，卻無戰鬥之技能。皈依天主教，卻從未在教會的位階方面受到擢升。」¹¹⁷因此可明顯看出其描寫的是一為小人物，甚至是底層人物，因此第二部分也是後現代的手法；而從史氏序言的開頭，即可發現史氏會描寫此人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為他有著相當豐富的史料紀錄，也因此史氏在書中提供了大量的資料細節，是以這部分是屬於傳統的近代史學做法。

第八本是《追尋現代中國》(1990)，這本書是史氏綜觀中國近代四百年來的著作，內容描述從十六世紀末的明代至二十世紀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筆者在第二章所述，史氏在書的最後寫出了一些中國四百年來不斷發生的事情，而這樣的行為也就代表了史氏是以近代歷史學的方法在著述的，因為他嘗試告訴讀者某種現象的「規律」，而不是僅單純的描述；而在描述對象的部分，由於此書橫跨時間較長，而史氏又想找出某種「規律」，因此書中提到的大多數人物，都是在中國歷史上占有比較重要地位的人物，因此第二部分也是傳統的近代史學範疇；而在著述方式上面，史氏為了讓讀者更熟悉中國的社會狀況，所以常舉出許多資

¹¹⁷ 史景遷，《胡若望的疑問》，序言。

料例如女性生育年齡的資料、物價指數的資料等，使得這本書變的相當具有真實性，因此屬傳統近代史學範疇。

第九本是《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1992），這本書是史氏把他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所寫的全部文章，選出一些他認為比較重要的部分，然後收錄在這本書中，其中包含了一些他的書評、業師介紹等，當然也有部分是描述到中國社會的，但大多數都是包含在前面所提到的一些書籍當中，因此筆者也就不幫此書作分析了。

第十本是《上帝的中國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1994），此書顧名思義就是在介紹太平天國，從其如何產生至結束，史氏在序言中也提到，他無意寫一本太平天國全史，他主要目的僅是要讓讀者了解洪秀全的內心世界，並沒有要給洪秀全下個結論，因此以第一種分析方法來看，即屬後現代史學；而在描寫對象上，洪秀全應當是屬於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以屬於傳統近代史學；而在寫作方式上，雖然史氏此書的目的與《康熙自畫像》一樣，都是為探尋人物的內心世界，但此時卻沒有像康熙一書那樣用第一人稱描寫，而是力求客觀的謹慎使用洪秀全所留下的手稿及太平天國相關資料，因此屬於傳統的近代歷史寫法。

第十一本是《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1997），這本書實際上不能算是史氏的著作，因為這是北京大學收集史氏在北京大學的八次演講內容而後集結成冊的書，因此筆者也就不對此書作分析了。

第十二本是《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1998），此書是史氏自行將其演講內容修改後而完成的書，其內容有很大部分與《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重疊，其內容是介紹西方人對於中國的看法，在書中史氏整理從十三世紀馬可波羅以來至二十世紀的西方人對於中國的觀察，這些人有小說家、有戲劇家、有冒險家、外交人員等，其中有褒有貶。因此，此書沒辦法以筆者所說的方法來分析。因為這本初呈現出的並不是史氏的思想，而是其中近五十位西方人的思想。

第十三本是《毛澤東》（1999），這本書顧名思義就是介紹毛澤東的生平，而

他在書中也沒有要找什麼「答案」，只是讓讀者更了解毛澤東罷了，因此在第一種分析方法上來看屬於後現代的想法；既然主角是毛澤東，則就自然屬於近代歷史學的觀念；在寫作方式上，史氏主要是整理其他學者對毛澤東的研究，再以自己的架構拼湊起來，別沒有太多史氏本身的主觀描述。

第十四本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2001)，此書講述的就是曾靜案的發生原由和結果，主要內容是描述雍正與曾靜之間的互動過程，並沒有給出任何「答案」，是以屬後現代史學的表現；而在描寫對象上雖然內容有曾靜，但此書以雍正為書名開頭，且此書陳述的是謀反這種與政治高度相關的事情，因此當屬傳統近代史學的範疇；也因此書內容與統治者有關，許多資料都是來官方檔案，如雍正的奏摺、曾靜的供詞等，屬於傳統近代史學的做法。

第十五本是《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2009)，此書是描述明末文人張岱的一生，史氏在書中透過對於張岱生活的描寫，欲讓讀者領略當時同樣身分地位的人的生活，並理解明末清初的中國社會，因此此書也沒有提供什麼「答案」或「結果」，而屬於後現代史學範疇；而張岱這個人，史氏在序言中寫道：「我們不能說張岱是尋常百姓，但他的確比較像是尋常百姓，而非聞人。」¹¹⁸因此可以得知史氏是把張岱當作原先的「它者」在描寫的，自然是屬於後現代史學；而在寫作方式上，史氏大量地引用《陶庵夢憶》的內容，看得出他力求反映張岱本身想法，也應屬傳統近代史學手法。

以上共有十五本書不同類型的著作，因其著作太多，且風格各有差異，因此史氏不容易被歸類。筆者在接下來的小結，對這些著作做了簡單的分類整理，以期讓讀者更容易掌握史氏在後現代表現上的特色。

第四節：小結

首先有三本屬於演講、介紹類的書先暫且不論，因這些書與其他著作差異太

¹¹⁸ 史景遷，《前朝夢憶》序言，020頁。

大。這三本分別是《中國縱橫》、《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大汗之國》。

而第一個分類為：其內容橫跨較多朝代、時間較長的著作，共有三本《追尋現代中國》、《天安門》、《改變中國》。這三本都有著很強的傳統近代歷史思維，雖然強弱上稍有差異，因為在《天安門》及《改變中國》這兩本書是以人物為主軸來描寫，也因此自然會涵蓋到稍微不那麼重要的人物，但客觀一點來說其實他們還是相當有影響力及名氣的，只是較不被一般大眾所熟知。

第二類則為：傳記類型的著作，此類書籍都不含「結果」或「答案」，因此硬要說的話該屬後現代，但筆者認為當史家決定要寫這類著作時，本來就不會抱有想找答案的心情，因此在判別此類型的書時，不該以是否含有「結果」或「答案」來進行分類。而這種類型的書史氏共著有七本，分別為《利瑪竇》、《康熙自畫像》、《太平天國》、《毛澤東》、《婦人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問》、《前朝夢憶》，其中前四本描寫的還是大人物，因此屬傳統近代史學，而後三本則以小人物為描寫的主要對象，而屬後現代史學。

第三類也類似傳記，但稍有不同的是，不像傳記主要是以單一個人為主來介紹，而是透過兩個人之間的互動來呈現作者想表達的東西。有兩本，為《曹寅與康熙》、《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而這種一人重要，一人不重要的書也確實不好分類，因此這邊特別把其與傳記類型分開。

在以上這些書中，僅有兩本有使用後現代的文學手法，讓「真實」與「想像」混淆，也就是《康熙自畫像》(1974)及《婦人王氏之死》(1978)，這兩本書也是在學界被討論最多的兩本，因其後現代色彩最重，從時間上來看，這兩本書都是完成於 1970-80 年代，此時正好是後現代思潮最盛的時候，「微觀史學」一詞的出現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可看出史氏在此時的確受到了後現代主義蠻大的影響。

第五章：結論——史景遷的定位

由於史氏上述的這些著史特色，使得許多人對他有著不同的認知，大致上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把史氏歸類為後現代史學家，第二種則認為他是傳記史家，第三種則稱他為歷史小說家。

一、後現代史學家

史氏會被歸類為後現代史學家的原因在第四章已有詳細的介紹，畢竟在史氏的著作中也的確有幾本書是幾乎完全以後現代筆法所寫，但從史氏對待理論的態度上來看，史氏並不太能被歸類為後現代史學家，因為史氏對理論並不感興趣，甚至抱持著懷疑，如他在受訪中就表示：「大部分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是相當短暫和過渡性的。」¹¹⁹因此雖然史氏跟後現代史學有類似的部分，但僅少部分相同，所以也難怪史氏在受訪時被問及是否有意運用後現代主義理論時回答「也許是，也許不是」這樣的答案了，因此筆者認為，史氏頂多只是受到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並不能把其歸類為後現代史學家。

二、傳記史家

史氏會被如此認為也是情有可原的，畢竟在其所有的著作中，就大約有一半的作品是以單一人物為主角來進行描寫的。如顧思齊教授就表示：「雖然史氏欠缺原始資料的考掘，也罕有歷史思辨上的發明，及學術原創性不足；但他在綜合、概括及選擇材料細節方面有相當功力，再加上其獨特的寫作優勢，在普及漢學方面並世無人可出其右，知人論世，正是史氏所長；因此最低限度至少要承認他是出色的傳記史家。」¹²⁰但顯然史氏並不認同自己被稱為是一位傳記史家。¹²¹

三、歷史小說家

據說錢鍾書先生曾在訪問耶魯時私下稱史氏為「失敗的小說家」。這也無可

¹¹⁹ 盧漢超，2005，〈史景遷談史〉，《史林》，第2期。

¹²⁰ 顧思齊，〈本土視野的美國「漢學三傑」〉，《南方都市報》，2006年2月13日。

¹²¹ 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 149.

厚非，畢竟他與歷史小說家的確存在一些共同之處，例如他們同樣都注重背景的烘托以及寫作技巧等，不過史氏並不認為自己的著作是歷史小說，他在受訪時就表示其著作與小說的差異，史氏說道：「當我們在使用『literature』一詞時，無論是指『文』或是『文學』，指的是用來傳達一種品質，一種批判，或是如何遣詞造句。然而當我們用『fiction』一詞時，它指的一種方法，而這種方法除了廣義上的合情合理外並不以事實為依據，也因此文學跟小說不同，而『literature』一詞還與一種藝術傳統相連。把文學和歷史相結合，意味著對史學的寫作風格有著激情且注意寫作的效果，再把書建立在這樣的架構上，既可以使其在一個層次上準確，又在另一個層次上表達感情，並給所敘述的故事更豐富的背景。這就像運用藝術一樣，使歷史寫作接近藝術以取得更深層的效果。」¹²²從這樣來看，史氏認為自己是將歷史和文學合而為一，而不是將歷史與小說合而為一，這兩者是不相同的，也就難怪史氏會說出：「我從來沒有寫過虛構作品」(I have never written fictions)這句話了。¹²³

另外，從史氏對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回應，也可得知史氏認為史學家跟歷史小說家的區別，阿特伍德認為寫歷史小說的三個原則分別是：一、不能去改變歷史事實；二、書中的主要因素在寫作中都要有所支撐，無論這樣子有多可疑；三、當面臨某些「尚未被解釋的領域，或尚未填充的空白」時，歷史小說家可以「自由發揮」。而史氏則認為對歷史學家來說，第一個原則存在的問題不是在於能不能去改變「歷史事實」，而是在於這個「歷史事實」到底是不是事實，第二個原則對歷史學家而言則是一個「黑暗的領域」，因為當越是去強迫證明一個假設的時候，越有可能將可疑的事情當作是歷史事實，而第三條則是歷史學家絕對不能去做的，雖然史家也可以用類似的方式去填補空缺，但是在修辭上卻是不能絕對化的。¹²⁴

¹²² 盧漢超，2005，〈史景遷談史〉，《史林》，第2期。

¹²³ 張潤芝，〈史景遷：中國近代史課本不該從屈辱講起〉，《時代週報》，2011年12月1日。

¹²⁴ Jonathan D. Spence. 「Margaret Atwood and the Edges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3, No. 5. 1998.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史氏在寫作時其實是以一個傳統近代史學家的自覺在書寫的，不管是把史氏稱為「後現代史家」還是「傳記史家」或是「歷史小說家」好像都不太妥當。而史學發展到今日，尤其是在史學多元化的影響下，一些傳統的史學概念則已需要重新定位，我們在史氏身上不僅可以看到古典文學對史氏的影響，例如他對文筆、情節的注重，同時我們也可以從史氏在寫史時力求所引史料無一無出處來看到近代史學科學化對他的影響，所以要對史氏進行評價，我們便需要從多個面向加以判斷才能夠較為公正客觀。因此像是中國學者馬金生就傾向將史氏定為：「一位在追求史料真實性的基礎上以敘事見長、歷史認知與理論方法含而不露的『新社會史學家』」。¹²⁵

另外，在綜觀史氏全部的著作後，史氏在中國會受到如此歡迎的結果就呼之欲出了，史氏從來都不是從利害、忠奸、貴賤等方式去看待歷史，而是不斷地改變視角，時而潛入皇帝的內心世界，時而又站到王氏這樣的小人物身邊，且他又保留了歷史最真實的一面——複雜。因此不論讀者是身處在怎樣的身份地位，都可以在史氏著作中找到類似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這些角色在史氏的描繪底下都對中國的歷史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影響，要知道中國在長久以來，倫常觀念所形塑的團結、家庭、國家等以群體利益為重的想法，都再再的壓制了「個體」的影響力，在現今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更是如此，但在閱讀史氏的著作後，每個人都能隱約地發現自己對中國的重要性，是以當然會對這位肯定自己價值的外國人感到興趣及歡迎了。

¹²⁵ 馬金生，2007，〈試論史景遷的著史風格〉，《史學理論研究》，第4期。

參考資料

一、中文：

專書：

楊大春，1995，《傅柯(Foucault)》，初版，台北市：生智出版社。

浦安迪，1996，《中國敘事學》，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周一良，1998，《畢竟是書生》，北京市：十月文藝出版社。

王晴佳，1998，《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初版，台北市：允晨文化出版。

麥勁生，2000，《近代史學與史學方法》，初版，台北市：五南出版社。

黃文斐，2000，《維柯《新科學》之中古性》，初版，台北市：台大文學院出版。

宋國城，2003，《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伊德》，初版，台北市：擎松圖書出版。

古偉瀛、王晴佳，2004，《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市：巨流出版社。

王海龍，2007，《遭遇史景遷》，上海市：書店出版社。

彭剛，2009，《敘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

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

翻譯書籍：

謝詒徵譯，黑格爾(G. W. F. Hegel)原著，1989，《歷史哲學》，台北市：水牛出版社。

林同奇譯，柯文(Paul A. Cohen)原著，1991，《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台北市：稻鄉出版社。

黃秀吟、林芳梧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1996，《胡若望的疑問》，台北市：唐山出版社。

廖世奇、彭小樵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1997，《文化類同與文化利

用》，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江政寬譯，凱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原著，1999，《後現代歷史學：從卡耳和艾爾頓到羅狄與懷特》，初版，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劉世安譯，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原著，1999，《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初版，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阮叔梅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2000，《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初版，台北市：台灣商務出版社。

溫洽溢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2001，《追尋現代中國》，初版，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

林宗憲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2001，《毛澤東》，初版，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社。

朱慶葆等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2003，《太平天國》，初版，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

溫洽溢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2004，《改變中國》，初版，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

夏俊霞等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2005，《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初版，上海市：上海遠東出版社。

溫洽溢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2007，《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初版，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

陳恒、梅義征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2007，《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初版，台北市：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李孝愷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2009，《婦人王氏之死》，二版，台北市：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溫洽溢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2009，《前朝夢囈—張岱的浮華與蒼涼》，初版，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

杜汝楫、邱仁宗譯，波普爾(Popper K.)原著，2009，《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溫洽溢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2012，《曹寅與康熙》，初版，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

溫洽溢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2015，《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二版，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

溫洽溢、吳家恆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2015，《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二版，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

期刊、書評：

馬敏，1997，〈耶魯怪傑史景遷〉，《讀書》，第6期。

陳國棟，2000，〈評 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新史學》，第11卷，第3期。

齊克彬，2005，〈史景遷的中國歷史研究〉，《國際漢學》。

盧漢超，2005，〈史景遷談史〉，《史林》，第2期。

鄭培凱，2006，〈歷史就是說故事：耶魯出身的史景遷〉，《翰城》。

馬金生，2007，〈試論史景遷的著史風格〉，《史學理論研究》，第4期。

于書娟，2007，〈微觀史學與我國的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科學研究》。

朱政惠，2009，〈史景遷史學探要〉，《史學月刊》，第1期。

汪榮祖，2009，〈夢憶裡的夢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

楊照，2009，〈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談史景遷的《前朝夢憶》和卜正民的《維梅爾的帽子》〉。

田一坡，2010，〈史景遷抓住中國月亮〉，《西部廣播電視》。

孫敬鑫，2012，〈史景遷：向西方講述「中國故事」〉，《對外傳播》。

郭琳波，2012，〈變與不變：史景遷《王氏之死》中的中國形象〉，《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張耐冬，2013，〈充滿爭議的史景遷〉，《環球人物》。

里奇，2013，〈研究中國的學者——《人文科學》對史景遷的採訪〉，《國際漢學》。

李爽學，2014，〈現代董狐如何再現中國？——史景遷著作中譯本總評〉，《中國企業家》。

李越，2014，〈從史景遷的《天安門》看 20 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新西部》(理論版)。

柳已青，2014，〈史景遷筆下的文人和皇帝〉，《黃河文學》。

靳錦，2014，〈史景遷的中國行程，在搖滾明星與拒絕《環球時報》之間〉，《壹讀》，第 40 期。

史坤坤，2015，〈史景遷史學特色探析——以《王氏之死》為例〉，《高校社科動態》。

謝嘉，2016，〈異質文化的探尋與書寫——試析史景遷《胡若望的疑問》〉，《名作欣賞》。

沈胡婷，2016，〈史景遷：用鮮為人知的細節構築一個豐滿真實的中國〉，《文明》。

郭欣華，2016，〈即將被查的眾官〉，《內幕》，第 56 期。

學位論文：

何吉龍，2009，〈史景遷的中國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李琛，2011，〈史景遷史學思想研究〉，江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張晶，2012，〈史景遷在《天安門》中對近代中國的書寫〉，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雷錦，2013，〈史景遷的康熙研究〉，安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報刊雜誌文章：

龍小立，〈從史景遷著作的水土不服說起〉，《文匯讀書周報》，2005 年 5 月 27 日。

汪榮祖，〈三少四壯集-史景遷寫康熙〉，《中國時報》，2005 年 12 月 12 日。

鄒景雯，〈陳水扁接見史景遷盼他也寫台灣〉，《大紀元》，2005 年 11 月 14 日。

顧思齊，〈本土視野的美國「漢學三傑」〉，《南方都市報》，2006年2月13日。

汪榮祖，〈史景遷論〉，《中國時報》，2006年11月5日。

李新、馬娟，〈史景遷：中國文化的複雜性讓人著迷〉，《21世紀經濟報》，2007年6月16日。

張燕冬、丘昭琪，〈史景遷：突破循環的歷史變遷〉，《財經》，2011年10月20日。

張潤芝，〈史景遷：中國近代史課本不該從屈辱講起〉，《時代週報》，2011年12月1日。

洪敬富，〈史景遷：蒙幸運眷顧的史學家〉，《南華早報》，2013年8月19日。

陸揚，〈史景遷的侷限〉，《東方早報》，2014年3月27日。

黃山、龍周園，〈史景遷：漢學家沒幾個，我也不是〉，《財新博客》，2014年3月31日。

李宗陶，〈史景遷的歷史之味〉，《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4月15日。

黎優，〈「史景遷熱」應休矣〉，《文學報》，2014年11月27日。

二、英文：

書籍：

Teng and Fairbank. 1954,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ymond Dawson. 1967,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1981,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Gail Porter Mandell. 1991,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Elizabeth Ermarth. 1992, *Sequel to Hi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al Tim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outhgate Beverly. 1996, *History: What and Why? Ancient, modern,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Georg G. Iggers. 1997,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Lawrence Stone. 1979,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 85.

Konrad H. Jarausch. 1989, *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Experience: Postmodern Predicaments in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ume 22, Issue 3-4.

Bruce Mazlish. 1992, *The Question of the Question of Hu*. *History and Theory*, Vol.31. No.2.

Jonathan D. Spence. 1998, 「Margaret Atwood and the Edges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3, No. 5.

會議文章：

Frederic Evans Wakeman. 2005, *Jonathan Spence B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From the General Meeting Booklet, AHA Annual Meeting.